

2011年春季号【总第5期】

2011.03 出刊

新视界

NEW VISION

学人访谈 孔子学院与公众外交

——访国际关系系韩召颖教授 P01

笔谈 核灾难离我们远吗? P46

青梅煮酒 聚焦胡锦涛主席访美 P48

他山之石 如何发表政治学类书评? P59

海外国关人 莱斯大学留学记 P64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



愿同学们把这份
对国关的热情保持
下去。

张若冰
2011年10月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



2011年春季号
【总第5期】
2011.03 出刊

*****About us*****

主编：陈冲

副主编：李金潼 徐芳宇 龚秀娟 李文婷

编辑部成员：

袁婷 陈永 张奕 狄英娜 阮艳婷
刘明 吕海 曹滢 张晓康 董柞壮
任娟 权贤美 姜忆楠 邓子立 王芳琳

封面设计：徐芳宇

*****Contact us*****

E-mail: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Website: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Blog: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注：未获本刊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本刊原创内容。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编的话

2500年前，赫拉克利特曾说：“除却变化，别无永恒之物。”在2010的终点上，我们曾满怀激情和信心地展望一个给力的新年，但是2011年开局的“变化”却让我们多了几分慎重与忧虑。

2010年中国坐到了世界经济总量“老二”的席位上，但对生活其中的国人来说，这个“老二”的荣耀却有些“喜感”：房价涨了，CPI涨了，人均收入也随之“被”增加了，可腰包里的钱似乎更毛了；因为我们是“老二”了，所以中国似乎可以“傲慢了”，中国可以说“No”了；就连年初的“胡奥会”也成了中美“共享世界权力”，“中美引导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历史新起点”……然而，我们真的“变得”（还是“被变得”）如此强大了吗？

2010年末，始自突尼斯的变局在中东北非的土地引发的动荡仍在持续。从本·阿里的出逃到穆巴拉克的下台，从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挑起的内战到如今北约诸国发起的所谓“保卫平民”的军事干预。这些变局让世人警醒非国家行为体在信息时代对国家主权完整、政权稳定的渗透与冲击，警醒西方大国口口声声的“人权”与“民主”不过是一张张掩人耳目的“画皮”。传统安全威胁的阴影尚未散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又给世界平添了几分阴霾。三月的日本地震与海啸唤回了人们对于印度洋惨剧和汶川大地震的悲痛记忆，而由此引发的核泄漏更是让世人对人类的未来充满疑虑：2012真的要来了吗？

本期《新视界》将带领您一起思考和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变化。韩召颖教授从担任孔子学院院长的亲历和学者独特的视角告诉我们破除外界的“中国威胁论”需要提升中国的公众外交。杨运程同学告诉我们，在一个高度网络化的世界中，核毁灭离我们并不遥远。知识虽有局限，但追求却无止境，无论是负笈海外，还是南开园的上下求索，我们国关人都在努力改变，我们都在坚守这块畅抒己见的阵地。

无论何种“变化”，我们终究避无可避。就让我们循着早春的旋律，携手改变我们的2011！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目录

主编的话.....	(I)
学人访谈	
孔子学院与公众外交 ——访国际关系系韩召颖教授.....	(1)
学术论文	
论雷蒙·阿隆的国际关系思想.....	杨吉平 (9)
书山有路	
社会网络、结构分析与国际关系 ——评《国家的网络》.....	陈冲 (20)
精神世界的回归? ——评《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	邓子立 (31)
国关人物	
约瑟夫·奈.....	(41)
笔谈	
两会与中国足球.....	温信赢 (45)
核灾难离我们远吗?	杨运程 (46)
青梅煮酒	
聚焦胡锦涛主席访美.....	(48)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目录

他山之石

- 如何发表政治学类书评? 阿拉斯达尔·R 扬 (59)
如何写作国际关系类书评..... 刘 丰 (62)

海外国关人

- 莱斯大学留学记..... 孙芳露 (64)

新书架 (一) (66)

国际关系论文工作坊

- 2011 年第 1 期论坛..... (69)

院系活动

- 学术交流 (72)
师生活动 (74)

学界动态

- 2011 年实证社会科学暑期培训班报名通知..... (77)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81)

征稿启事..... (85)



孔子学院与公众外交

——访国际关系系韩召颖教授

【编者按】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渐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心态走向世界。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建立，中国语言和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也成为了国内外广泛讨论的议题。中国孔子学院的办学机制是怎样的？它的发展现状如何？它能否对削弱“中国威胁论”、改善中国国家形象发挥积极的作用？孔子学院与近年大力提倡的公众外交是什么关系？我国的公众外交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韩召颖教授以亲身经历讲述孔子学院的办学、发展，并从研究者的视角厘清了人们对“软实力”“公众外交”等概念的误解，指出了我国公众外交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政策。

【人物】韩召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1968年生于山东省莱州市，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研究和教学工作。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著作有《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专著）、《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译著）、《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合译）等，在《美国研究》、《外交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新视界》：韩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知道，中国的孔子学院近年来发展迅速，您去年在美国担任了一年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对孔子学院的管理及运作有切身的感受。我们先请您谈一谈中方和外方两位孔子学院院长具体是怎样确定的？他们各自的职责是什么？对于孔子学院的办学资金中外双方又是如何分担的呢？

韩老师：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每一所孔子学院中方和外方两位院长人选的确定都不太一样。现在世界上大概有 300 多所孔子学

院，每一所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说这两位院长在孔子学院运作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责和任务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根据我的了解，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尽管有外方的院长，但具体的工作主要是由中方的院长在负责，比如在当地社区、中小学推广汉语等，基本上都是中方院长负责。有的外方院长是所在大学的教授，有的还承担了一些行政职务，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但主要的工作是中方院长做的。但也有另外一些情况，中方院长基本上是辅助外方院长做工作。我在南佛罗里达大学期间正好遇上了这两种情况。我刚去任职的时候，美方是一位代理院长，没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主持孔子学院的工作，主要的日常工作基本上由我承担。但最后这半年美方专门聘任了一位专职院长，我的角色也发生了转换，主要是辅助美方院长工作。因此，每一所孔子学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比较灵活，也表现出一种多样性。

至于孔子学院的办学资金，每个国家或地区可能也不太一样。国家汉办通常每年向每所孔子学院提供 10-20 万美元的正常办学资金，外方主要是以教学设施和人员投入作为资助方式，比如说提供办公场所、教室，还有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负责孔子学院的一部分工作，也是折合成资金，作为外方的投入。在这方面每个孔子学院可能也有所不同。此外，据我所知，少数孔子学院在所在的地区或学校通过各种渠道还是获得了外方的资金注入。德国的歌德学院，英国的英国文化委员会，法国的法语联盟，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会等都从事着自己国家语言的推广工作，他们的方式主要是靠自己做，而中国的孔子学院更注重与外方机构的合作。

《新视界》：我们了解到，中国办孔子学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希望借此传播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我们从有关资料了解到，德国的歌德学院始建于 1951 年，目前共有 144 所，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创办于 1991 年，至今仅有 30 多所。而中国的孔子学院从 2004 年至 2010 年 10 月，已发展到 332 所，几乎每 6 天就有一所孔子学院诞生。因此，有人担心孔子学院发展如此迅速，是否能够保证其办学质量。而且还有人认为，目前孔

子学院传播的只是一些单纯的中国文化知识，并没有承载中国的文化理念或价值观念。您怎么看待孔子学院目前的发展现状？它在提升中国“软实力”方面是否能够发挥一些作用？

韩老师：首先，对于中国使用“软实力”这个概念我并不十分赞同，我是反对“中国软实力”这样一种说法的。不要别人用了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也拿来就用。美国讲“软实力”是因为它的“硬实力”太强了，到处都去插手，它要找个东西把“硬实力”包裹一下，它需要说“软实力”。实际上，提中国的“软实力”在国际上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未必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反而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损害。中国要“硬实力”又要“软实力”，外国就会怀疑中国的意图和行为。如果真正地如何让外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动不动就讲“中国软实力”。

我们在对外交流过程中，最好不要动不动就把孔子学院与“软实力”联系在一起。我觉得现阶段孔子学院所做的事非常简单，就是推广中国的语言与文化，这是它的使命，本身的目的是希望其他国家的人民加强对中国更深入、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我认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总体上是令人满意的，现在我们应该有一种自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们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但我们相信社会发展的主流还是好的。其他国家及其人民对中国了解得越多、越全面、越真实，不论是好的方面还是不好的方面，越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我们不



能只说好的，我们也有问题，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我不赞成把孔子学院与“软实力”联系在一起。

我认为，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有 300 多所孔子学院，并不能算多。你想想，一个德国的人口是多少？世界上讲德语的人是多少？但德国就有 140 多所歌德学院，而我们作为一个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难道说建设 300 多所孔子学院算多吗？我想说的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怎样更科学。套用发展经济的“口号”，就是要“又好又快地发展”。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改善，但是孔子学院的数量确实不算过多。就我了解的情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了解也还并不是很多。

外交是什么？外交是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是实现对外政策的工具，它必然受到我国对其他国家对外关系、对外政策的影响。很多事情都有主次之分，所以孔子学院在与我国关系密切的地区设立得多一些，这些也是我们外交工作的重点，比如美国、欧洲、日本。但是同样的，我们跟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非洲地区、拉美地区。尽管我们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一些孔子学院，但相对来说数量还是比较少，包括在中东地区、南亚地区也还并不是太多。所以我觉得不能笼统地说孔子学院发展得快了或者发展多了，因为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去分析，要去动脑子，不能一看数字就觉得多了，而应该客观地去分析。

另外，涉及孔子学院的问题，我还想再说两句。我们目前的孔子学院主要是以汉语

推广为主。我希望孔子学院在促进其他国家对中国了解方面，能够更上一层楼，提高一个层次。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的基础，但除此之外，对于中国各个方面的研究——比如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掌握了语言之后，再提高一个层次的话，就是对中国各个方面更深入的了解。而更高层次了解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应该说做得还不是太多，或者说刚刚开始做。相比较其他的国家，特别是比我们发展得早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尤其是促进国外的中国研究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至于说在中国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的传播方面有所欠缺，这个不是我们说说话就能解决的。中国的价值观念，或者说我们现在总在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不是说两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整个社会、几代人长期努力才能完成。说到这点，中国实际上在 19 世纪前是有比较突出的核心价值观念的。但是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却出现了断层。“五四运动”可以说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思想观念，或者说中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中西的这种交融使我们接触了更多西方的东西，但是也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后来的“文革”恐怕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更大的冲击。一系列的原因致使今天，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很快，然而许多人在精神方面、价值观念方面，处于一种迷失的状态。

今天早上我开车的时候听到一个电台



在播送一部小说，讲到德国。德国经济发展比较快，但是德国有个学者说：“如果我们没有谢林，没有歌德，没有德国的那些思想家，那么今天的德国就是一个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的荒漠。”这说得非常深刻，也非常适合中国现在的国情。我们现在有高速铁路，我们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但是从人的精神世界，从人对价值的追求来讲，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很多人盲目地到外国去，但对国外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好像到了国外遍地都是黄金，国外都是天堂。这就从某个方面体现了一些人在精神上的迷失。

《新视界》：韩老师，刚才您提到了中国不要提所谓“软实力”，因为这可能引起国外的猜疑。但是在国际上，“中国威胁论”还是甚嚣尘上。那您觉得孔子学院能否改变“中国威胁论”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

韩老师：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可以把公众外交的活动分为两类，一种属于服务于短期目标的活动，让其他国家更快地了解自己国家的政策、信息、社会等方面，也就是短期的信息交流项目。它主要介绍目前的社会情况，特别是你的国家的政策，希望其他国家的民众能对你的国家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理解。不一定要表示支持和赞同，但是至少要了解和理解，不至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弹或反对。

还有一类项目就是教育和文化的交流，是着眼于长期的。从更深入、更长期的角度来加强其他国家民众对自己国家的了解。这不是一个短期项目，不可能做到我教人家学

汉语，他们对中国的认识马上就改变。我觉得这更像是在那个地方播撒种子，然而这个种子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却不是目前能看到的，这是教育和文化交流的特点。我们不能保证这些学汉语的人以后都是亲华的。我们做孔子学院的目的是使他们能够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更多地了解中国，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中国。孔子学院办上个三年五年，甚至八年十年，也未必能让这些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马上发生根本的改变。

但是我们也应该相信，而且事实也是这样，我们通过这种长期的交流项目，能够在这些国家吸引一批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有着比较全面了解的人。这些人里，可能有些就是普通的民众，但是有些也可能是社会的精英，甚至国家的决策者、国家的领导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比如要离任中国驻华大使的洪博培，他从70年代起就到台湾跟中国有交流。如果多一些这样的人对促进中国文化交流是不是会更好？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交往，是不是在这个人的成长经历过程中就不会看到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努力？如果以后的美国驻华大使或者说别的国家的驻华大使有不少都是在我们孔子学院学过中文的人，你说他们对于改善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认识有没有帮助？他们也许还会讲中国对世界的威胁，但是至少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真实的。当下除了“中国威胁论”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质疑中国的言论。我觉得我们对于外界的批评应抱一种平和的心态，用句毛主席以前说过的话来讲，对于别人的批评“有

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存在问题我们改，没有问题就走自己的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中国是不是威胁，也不是他们说什么是，我们也不能堵住别人的嘴不让别人说，我们通过孔子学院和其他的项目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这就足够了。

《新视界》：也就是说在老师看来孔子学院这种办学形式，能够让人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长远看来也能让“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外界经过了解也会对某些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不会再继续停留在表面上的理解了。

韩老师：这算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吧，长远来看这种长期项目是很重要的。

《新视界》：刚才您提到了孔子学院不仅是一种文化外交的形式，也是一种公共外交的形式，这两种似乎各有特色，但也存在一定的重叠，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韩老师：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在国际学术界上是有不同说法的，在法国就叫国际文化关系，英国就叫文化外交，法国有对外文化政策，实际上，这些做法在本质上都属于公众外交活动。

《新视界》：实际上，这两者是合并在一起的？

韩老师：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一样的。实际上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应该叫做公众外交，

“public diplomacy”实际上翻译成“公众外交”更好一些。因为文化外交强调的是交流的内容，相对于军事、政治、经济而言，文化是一个涵意比较广泛的概念；公共外交更多强调的是对象，把外国的公众作为对象。现在很多人都使用公共外交的说法，我做研究的时候，曾认真地思考过“public diplomacy”是译成“公众外交”还是“公共外交”更好，译为“公共外交”强调了其所发挥公共关系的作用，从职业外交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避免称公共外交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们是针对外国的公众。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严格来讲是一回事，只不过一个强调内容，一个强调对象。相对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外交靠的是说服力，以理服人，是一种人文交流。

当然我个人觉得更好一些，并不是我说的就更准确一些。很多人以为这个东西和公共关系是一样的，但我认为还是译为“公众外交”更好，因为它既包含了一种公开的、区别于传统的方式，又讲明了这种对象；公共外交是指国家的一种公关，但这种认识相对要狭隘一些，公众外交是一种公关，但又并不限于此，公众外交活动有利于加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世界和平。

《新视界》：提到公众外交，似乎人们现在普遍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做的是比较成功的，您对这个怎么看？您觉得对比美国的公众外交，我们的公众外交在形式和内涵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韩老师：你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做的是成功的，



但美国人其实并不一定这么认为。有些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公众外交有很多的批评，不过，美国在这方面确实有自己的特点——规模较大，向外输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它的鲜明特点。

中国的公众外交也有着自已的特点。中国的公众外交绝不是近些年才有的。公众外交都包含哪些活动？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实际上包括直接的对外政策宣传和教育文化交流。这样的人文交流活动，其实我们早就有了，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武汉设立国际小组，这个小组的目的就是让西方了解延安、了解中共的抗日活动，同时也结交了一批西方人士，如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他们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到了延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这样的活动也一直有，比如直接的对外宣传就是为了对抗西方国家针对中国所进行的反华、反共宣传。我国有一个机构叫外文出版社，负责多种杂志的出版和多家出版社，它主要是负责向境外发行多种出版物。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熟悉的电台、新闻机构，其中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等等。所以说，我们早就有这样的对外交流方式，它实际上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众外交活动。至于教育文化方面，我们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有外国留学生，当时有很多来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的，也有许多来自非洲、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这些都应该属于公众外交活动。

自改革开放以后，公众外交的形式也发

生一些变革。最近这些年，特别是从90年代以来，我国公众外交活动不断得到加强。90年代初我国设立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要是负责对政策和我国国情的宣传或提供相关的信息。也有半官方的机构，如对外友协、外交协会等等，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所从事的针对国外民众的交流互动，应该也算是公众外交活动。2004年之前，虽然中国也从事大量的相关活动，但很少使用公众外交这个概念。近些年，公众外交这个概念使用得越来越多。

这里需提及的是，公众外交和民间的交流是有区别的。现在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所有宣传和教育活动都是公众外交。如果我们把所有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都称为公众外交，那就把公众外交这个概念泛化了。我们还是要区分好官方的和民间的交流互动——所谓官方的交流活动，就是有政府政策鼓励或者支持的活动，包括资金支持的。这种属于政府明确支持或参与（或者说有主权国家参与）的活动，才算是真正的外交行为；至于民间交流就不适宜称之为公众外交，它就是一种民间的文化交流。我认为，民间文化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政府不应该越位。在开展公众外交的时候，要明确我们的目标和活动，哪些活动更适合政府从事，哪些活动更适合由民间从事，或者说哪些由民间人士或机构做，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新视界》：韩老师您刚才提到我国的公众外交有很长的发展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需要发展得比较快。但是正如您之前提到



的,我国公众外交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免出现一些问题,请问您能否具体地谈一谈我国公众外交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国又该怎样应对?

韩老师: 首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由于公众外交的概念比较新,目前在中国比较泛化。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目前从事公众外交的机构和部门众多,很多中央部门里直接与外交相关的部门,比如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等主要核心部门,还有文化部、教育部、妇联等等的一系列部门也从事一些相关的公众外交活动。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半官方的机构,比如刚才提到的友协、外交协会等等也都参与其中,甚至包括我们的政协、人大。造成这种参与部门众多的复杂局面的一大原因就是我国与西方体制存在很大差异。我国相对来说是一个中央权力集中的国家,所以我国很多部门在对外交流的时候有官方的立场,也有的直接拿着政府的补贴,在本质上讲都属于中国的公众外交。因为参与的部门众多,就造成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存在问题。举例来讲——从教育系统来讲,孔子学院在全球建校三百多所,文化部在全球也有7所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和文化中心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甚至有的美国的议员就把孔子学院看做是中国文化中心。对于这些活动,究竟应该如何协调?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重视或得到解决。

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协调机构,就是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但是这个领导小组主要管理的还是对外宣传或提供信息方

面的工作,对教育文化交流方面的活动参与很少。还有个具体问题,虽然在向国外提供信息方面,我国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级政府都设立了英文网站,但是我们国内政府部门的这些门户网站,尤其是有英文版的门户网站的建设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更新不够及时。外交部从事外交活动,理论上讲它的英文文件在其网站上的更新速度应该比较及时。但可能是因为工作量太大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外交部的网站上英文文件的更新还是不够及时。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我国对公众外交活动在政策指导上仍然存在着不足。公众外交,或者说文化外交也好,毕竟是为我国国家整体的对外政策服务,也为与交流国家的交往和对这个国家政策的解读服务,目前我国在机制上缺乏对这些交流活动的政策指导。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这方面做的仍有待改善。比如像美国的“富布赖特项目”,它是一个美国国务院负责的项目,在政策方面一直接受国务院的指导。反观我国,外交部对孔子学院总部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的工作上的指导,虽然不能说是没有,但是实质上是比较薄弱的,反映了在政策指导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公众外交的概念也是刚刚提出的,以前的工作落实在各个部门都是比较分散的,呈现出一种碎化的状态,我国在加强对各种公众外交活动的协调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新视界》: 感谢韩老师。最后再请您对有志于将来从事公众外交实践工作的同学们提一点建议,也请您对咱们系的同学说点私



房话。

韩老师：好的。我觉得对于将来要从事公众外交的同学来说存在很重要的一点——当然你要学习专业、外交等方面的相关知识，但是这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国家文化的热爱和了解。不仅仅是对相关课程的学习，更是要有一种热爱，自己也要比别人对本国文化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根据我个人在国外的经历，我感觉在国外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有一种冲动和渴望，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解我们自己国家的制度。因为你在国外就会看到，很多外国人在一些我们认为他们应该了解的问题上反而是一无所知，每当这个时候你就会希望能向他们进行介绍，让他们对中国产生兴趣。要想让别人对中国产生兴趣，首先要求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即使你不是在孔子学院从事工作或者说代表哪一个政府或者官方部门去从事交流的人，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国外你就代表着中国。我们不能说自己代表着中国，但是在外人眼中我们就代表着全体中国人。你某一件事办得好，别人会说中国人不错，反之亦然。人们不会记得你是谁，人们只会记得你这张中国人的面孔。

还要更多的考虑如何修身、如何加强自

我修养，做人还是要做一个有品格的人。对于要从事公众外交工作的人来说这两点都是十分重要的。还要注意把专业的知识学好。

下面谈谈咱们系里。我们国际关系系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他们的入学成绩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学一门专业就要培养对这门专业的兴趣，热爱这个专业的学习。人的路是走出来的，没有什么所谓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区分。我在咱们系里也已经工作了十二年了，我个人看到那些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同学，最后工作或者说毕业后个人的发展情况都是不错的，只要你付出了，就肯定会有收获。当然我们允许同学们有不同的兴趣和爱好，但是，如果总是见异思迁，将来很可能就会一事无成。这样的例子我们作为老师已经看到太多太多。所以希望大家一是能够持之以恒、二是能够培养兴趣。

《新视界》：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教导和嘱托，也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

[采访：李金潼、李文婷、龚秀娟、吕海]

[整理：李金潼、李文婷、权贤美、吕海]

[审校：韩召颖]

[责任编辑：李文婷]

论雷蒙·阿隆的国际关系思想

杨吉平*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论述雷蒙·阿隆的国际关系学说及其哲学基础。作者指出历史主义思想是理解阿隆国际关系学说的关键。阿隆认为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 大国相对实力的消长是体系难以保持稳定的最重要原因, 工业社会对国际关系影响巨大。阿隆不赞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主张, 提倡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伦理领域, 他是个道德怀疑主义者, 认为怀疑和妥协是实现和平的最佳途径。

关键词: 历史主义 趋同论 历史社会学 道德相对论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是20世纪法国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他与萨特(Jean-Paul Sartre)齐名, 是法国右派的代表人物。阿隆涉及的学术领域极为广泛, 包括哲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等领域。他在推动国际关系在法国成为一个独特研究领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 在法国他几乎是“只手将国际关系研究从历史和哲学研究中分离出来”。^①

一些学者对阿隆的国际关系思想进行过讨论, 却很少有人正确地指出其国际关系学说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本文试图探寻这个思想基础, 并追溯阿隆如何从此出发构建他的国际关系学说。工业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对国际体系稳定产生了哪些影响? 热核武器的出现使和平主义者相信可以实现“恐怖主义下的和平”, 那么这种和平是否可能? 核武器是否因此根本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 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与战争关系的论断是否因此而过时? 阿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传统与科学传统之间“什么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合适方法”的争论, 阿隆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这两个传统都有深刻理解。他独特的认识论反思及方法论主张有助于填补传统主义与科学主义方法之间的鸿沟。

21世纪初期人们深受“文明冲突论”描述的惨淡前景的影响, “9·11”似乎印证了这种担忧, 文明之间的冲突会不会成为21世纪冲突的主要形式? 文明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之间能否避免这样的冲突? 如何避免? 文明会不会取代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 阿隆对历史哲学的深刻思考及论断对我们回答这些重要问题都具有启发意义。

一、阿隆的思想背景

在经历了《凡尔赛条约》签订的短暂和平后, 西方各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一战”的原因, 和平主义运动在各国兴起。如美国参议院奈伊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认为军火商和大企业在美国卷入“一战”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这促使“孤立主义”在美国复兴, 孤立主义是和平主义的美国式

* 作者简介: 杨吉平,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08级博士生。

① Edward A. Kolodziej, “Raymond Aron: A Critical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y Quarterly*, Vol.29, No.1, 1985, p.6.



表达。在英国，丘吉尔因为牛津一个俱乐部活动中大家投票“决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而耿耿于怀。

^① 在法国，和平主义表现为反对权威的思想。他们认为“一战”是权贵之间的斗争，权贵们为了自己一己之利而将民众拖入战争。阿隆在巴黎高师的老师阿兰（Alain）就是和平主义的代表人物，阿隆深受他的影响。

“一战”后法国知识界盛行的仍是康德的世界主义，阿隆这样描述当时的思想状态，“那时我对社会状况与国家经济状况毫无透彻的理解，仅从自己的某些感情出发盲目地观察和判断外界事物。我倾向和平主义，厌恶战争，赞同左翼思想观点，主张世界大同以抵制先辈的民族主义。我对有产阶级和强权势力深恶痛绝，对社会主义则怀有模糊不明的同情心理”。^② 知识分子普遍的和平主义思想在面对纳粹挑战时变得支离破碎，逐渐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这也导致了知识分子本身巨大的分裂。左派知识分子认为纳粹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应该改造资本主义，在外交上联合苏联，学习苏联的社会改造实践，这些知识分子自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右派则认为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两个威胁，极端右派甚至叫嚣“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温和右派认为与苏联结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纳粹威胁更直接、更迫切，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与无神论思想与资本主义和基督教思想格格不入，苏联的社会改造成果也乏善可陈，纪德（Andre Gide）的《访苏归来》强化了右派的这种认识——与苏联合作只是形势所迫，一旦战争结束，与苏联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萨特选择了前一种观点，阿隆选择了后一种观点，这两位对 20 世纪法国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自此分道扬镳。^③ 冷战期间萨特代表的左派知识分子在知识界处于主导地位，阿隆的声誉远不及萨特，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的扩张主义和自身衰落证明了阿隆观点的预见性，阿隆的思想又受到人们广泛关注，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国际关系思想。

“二战”及其后的冷战迫使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但阿隆的政治立场只是被这两个历史事件所强化。他最终放弃早年的和平主义信仰，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和右派。这一转变发生在他在德国的三年留学生涯（1930-1933）。阿隆在这三年中完成了他思想的决定性转变，在德国形成的思想成为他之后所有学术与政治思考的基础。

《凡尔赛条约》在协约国眼中，尤其在法国人眼中是正义的象征，能深刻认识到条约缺陷的人少之又少（凯恩斯与福煦是两个例外，前者认为条约太严而难以持久，后者认为法国的国界应该推至莱茵河）。阿隆在德国意识到条约并不是正义的胜利，而只是法国的暂时胜利，德国几乎所有阶层都对条约不满，认为应该对条约进行修改，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数德国人都是修正主义者，甚至包括努力与西方改善关系的温和派（这从斯特莱斯曼写给流亡德皇的信中可以看出）。阿隆在德国的三年目睹了纳粹逐渐成长乃至最后夺权。希特勒的主张就是要改变现状，扩展德国的生存空间。阿隆在德国曾亲历希特勒的演讲，从观众的反应来看，修正主义是德国各个阶层的一个共识，经济危机的影响使这种共识进一步扩大，对此法国政府浑然不觉，在希特勒的种种冒险面前犹豫不觉。

^①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风云紧急》（吴万沈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4 页。

^②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政治反思》（杨祖功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4 页。

^③ 阿隆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他和萨特从青年时的朋友，到中年时的思想对手、陌路人到暮年时“和解”的历史，另见[法]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 世纪的两位知识分——萨特与阿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一）历史主义及其思想渊源

在德国的经历动摇了阿隆的和平主义信仰，阿隆此时接触到的一种新思潮适时地取代了不合时宜的和平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就是历史主义思想。历史主义是更广泛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历史、社会研究中的对应物。自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以来德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在文化、政治等各领域全面落后于当时的法国。德国人在面临法国全面优势时，通过否定法国思想，肯定自己特点，以形成“内在的优势”。源自于法国的启蒙运动相信借助普遍理性可以逐渐认识整个世界，社会改造原则上可以通过理性设计完成，理性可以帮助实现完美社会，法国大革命就是这场运动的产物。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针对理性的普遍性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个体性”观念，认为理性的整齐划一不仅是对事实的歪曲，在道德上也不可取，多样化才是这个世界的特点。^①

伯林（Isaiah Berlin）总结了浪漫主义的三个基本信条：人类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本质；人类的价值是被创造而不是被理性发现的，所以无法构建任何命题体系来加以描述；没有什么可以保证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或不同个人价值会必然地和谐共存。^② 浪漫主义成为一股重要的反理性主义思潮，这种思潮逐渐在德国占据支配地位。

历史主义是浪漫主义在社会研究中的对应物，伯林曾指出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是历史主义者。历史主义最初的提出者是维柯、赫尔德，经过德罗伊森、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发展，在特赖奇克和梅尼克手中达到成熟。它的核心观念认为自然与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时有着重要区别，因此在社会和文化科学中需要一种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自然是不断再现的事物活动的舞台，那里的各种现象本身缺乏有意识的目的，而历史则由具有意志力有目的的、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人类行为所组成。^③ 历史主义反对自然法的传统，认为每个时代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原则，对此可以加以理解，却不应该用我们自己的价值对其加以批判。

在政治领域，历史主义将对“个体性”的崇拜转移到民族观念上，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使命需要完成，实现这个利益是每个公民最高的道德要求，民族认同比个人和世界公民的认同更重要，为了前者可以牺牲后者。^④ 国内政治的斗争需要服从争夺国际空间的斗争，这为集权主义与独裁埋下了祸根。“为了实现一个国家的利益，可以置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于不顾”这一观点则为强权政治观的产生准备了条件。^⑤

① 伯林认为这是斯多葛式的，弱者面对强者时回归内心的表现，见[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卡尔·洛维特提出了与这种“个体性”对抗普遍理性相似的看法，他认为西方世界自古罗马以来就追求一种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人类统一，西方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追求这种统一的不同尝试的历史，但德国对这种追求统一的努力表现为一种“永恒的抗议”，“从来都不愿意与任何继承古罗马使命的民族统一”，德国对古罗马式的世界统一的反抗是“否定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主义思想是反抗世界统一的一种新形式。见[德]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元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164页。

② 伯林：“浪漫主义革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场危机”，《现实感》（潘荣荣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③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④ 历史主义主张为国家牺牲生命是荣誉，这种轻视个人生命的观点克里蒙梭难以理解，所以他才会认为德国人“心中充满了一种病态的、恶魔般的对死亡的渴望，这些人多么热爱死亡啊”。见《克里蒙梭与马尔特的进一步的闲谈》，转引自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第48页。

⑤ 更多关于浪漫主义者政治思想的特征还可见[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在道德领域，历史主义的逻辑结论就是道德怀疑论、道德相对论。历史上很多哲学都曾支持怀疑论的道德观，如古希腊的智者学派、泛神论者、休谟、孟德斯鸠，但近代政治伦理学中的怀疑主义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来源是历史主义。理性主义认为可以自普遍理性中推导出对全人类普遍适用的道德准则，某些人没有理解这些准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被“启蒙”。历史主义反对从理性中推导出道德准则的路径，认为理性与道德分属不同范畴，道德无法理性地得出，道德来自每个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因为“从生命中最深层次的个体性中流出的东西不可能是不道德的”。^① 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不同，所以他们的道德哲学也不同。

（二）阿隆的历史哲学

德国经历体现在阿隆回国后出版的三本书中：《当代德国社会学》、《论历史理论的德国学派》与《历史哲学导论》（后文简称《导论》），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导论》，它是阿隆以后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思考和道德判断的哲学基础。他的导师莱昂·布伦什维格说，“这本书包含了一生一世的计划大纲”。

《导论》的主旨就是讨论“历史客观性的限度”。阿隆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孔德以来法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传统，接受了历史主义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性质不同的观点。阿隆认为在社会研究中，对“他者”存在的感受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征，而我们面对自然界时没有对这些研究对象的感受。对“他者”的感受因对象与观察者所共享的知识不同而不同，在一个民族中，因为大家享有共同文化、历史与传统，所以大家可以相互理解，但超越民族界限之外共同知识的缺乏使不同民族之间理解变得困难，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往往具有不同理解。^②

由此扩展到历史研究中，阿隆认为历史研究中没有不偏不倚的客观裁判员，所有判断和解释都是视角性的，因此也就是相对的，历史无法克服这种相对性，因为生活经验构成了这门科学的材料，这些事实虽然超越了个体，却不是自己存在，而是被意识感觉，为意识而存在的。历史考虑的客体不仅仅是过去的（如果是一件事）和消失的（如果是一种自然或人类的条件），客体存在于人的心灵里，随人的心灵而改变。^③ 这些思想体现了“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传统”（梅尼克语），是阿隆以后政治思考的起点，也是他的国际关系学说的思想基础。

二、阿隆的国际关系学说

（一）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

历史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价值的最终来源，实现民族目标、为此牺牲是公民最高的道德义务。阿隆接受了历史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强调，认为它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行为体，国家外交决策只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普世利益或个人利益。

① [德]费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德文版导言，第32页。

② Raymond Aro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George J. Irwi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1, pp.63-65.

③ Raymond Aro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p.289.

“二战”时纳粹的种族屠杀政策以及欧洲盛行的反犹主义促使阿隆反思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阿隆的犹太人意识并没有取代法国公民的身份意识。阿隆自认为对以色列只有情感上的联系，在涉及法国与以色列关系、法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时，阿隆总是从法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种族纽带没有取代阿隆的民族国家认同。

欧洲联合是 20 世纪欧洲的一件重要历史事件，阿隆目睹了西欧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这些国家试图通过联合来消除战争根源的整个过程。阿隆认为欧洲联盟只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联合，“主权让渡”本身是个矛盾概念，因为主权就意味着“在危机或特殊的情况下，做一些重要决定，以改革现有体制或在现有体制的框架下改善公共福利”，^① 主权本质上意味着最终决定权，而“让渡”概念模糊了谁最终决策的问题。欧盟是欧洲国家摆脱普遍衰落的一种尝试，实现欧洲各民族复兴以及在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下享有独立发言权是欧洲联合的真正目的，“欧洲在对昔日伟大的怀旧和今天的不承诺、超国家联合的诱惑之间摇摆，这些昔日霸权缺乏资源作为一流大国的竞争者，却仍拥有足够资源在联合中得到安全”。^② 欧盟并不是对民族国家的否定，欧洲统一的目标并不实际，冷战之后，欧盟的发展印证了阿隆的判断，虽然欧盟继续扩大，但这种扩大的背后更突出了它是民族国家之间的联合，而不是要取代民族国家。要统一就不应该扩大联盟，成员国越多，真正的统一越难，因为“集体行动的逻辑”难以克服。

欧洲联合掩盖不了 20 世纪 60 年代在第三世界兴起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热潮，民族意识并没有在欧洲消失，而前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建立了民族国家，他们的民族意识正处于觉醒阶段，更谈不上衰落。民族国家仍是对内统治，对外扩张或防止侵略的最主要工具，民族国家在可见未来仍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和平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冲突不断的根源，消灭了民族国家就可以实现普遍和平，却忽视了历史主义所激发的民族独立热情。

（二）阿隆论战争的原因

阿隆国际关系学说的一个特点是他没有提出类似现实主义六原则与结构现实主义这样的核心理论，他的国际关系学说建立在对其他各种理论的批判基础之上。阿隆对战争原因的理解也是建立在对其他战争原因学说反思的基础之上。这里根据层次分析法分析不同“意象”在阿隆战争起源学说中的地位。

阿隆从来没有诉诸人性来解释战争的发生，因为这种解释存在问题。如果人性是战争的原因，国家之间为什么有时候处于和平状态，有时候却处于战争状态（鉴于人性一直没有变化）？阿隆不赞同以人性来解释战争的发生还在于他赞同卡尔·施密特的一个学说，认为朋友与敌对关系的存在才是政治的本质。^③ 没有敌对关系，就没有政治，在普遍人性中不存在对立因素，所以从人性角度无法理解政治。

①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lated by E. Pavel,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pp.745-746.

②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p.402.

③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p.766. 另见[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论断与概念》（刘宗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3-68 页。卡尔·洛维特也这样描述过，“他们（德国人）始终需要一个敌人，或者需要一个替罪羊，如此才能决定自己的模样”，见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第 160 页。

阿隆认为历史人物在历史中发挥着一定作用，他们可以用来解释部分历史事件，如希特勒在纳粹运动中的作用。阿隆深受米歇尔斯、帕累托等人的精英主义思想影响，认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个精英阶层的存在，他们在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阿隆认识到很多民族确实呈现出“民族性”特征，这些民族“展现出一些行为风格，这些风格在不同情况下，或是与理性算计有关，或与心理-社会倾向或文化系统有关”。^① 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与美国等国家都展现出一定的行为风格，这是因为民族总是历史产物，是几个世纪的作品。但民族性对解释战争起源只具有启发作用。一方面民族性具有相对稳定性，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民族性没有变化，而国家有时候发动战争，有时候具有和平主义倾向甚至绥靖。另一方面民族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事件会对民族特性产生影响，进而塑造新的民族性。阿隆认为民族性在解释战争起源时只起辅助作用。

有些学者认为某种政体的性质对战争是否会发生起重要影响，如 20 世纪初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和平主义倾向，资本主义本身就孕育着战争。20 世纪末一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因为民主制使大众在是否选择战争过程中起着更大作用，民众都不希望参加战争（民主和平论）。阿隆对这两种说法都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对主导地位荣誉的追求是一切国家都努力追求的，不管这个国家的制度性质如何，也不管这种追求理性来看是否有利可图。阿隆赞同摩根索对“帝国主义”的定义，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而每一个意识形态大国，不管其经济制度如何，如果其希望将政府模式加于其他国家身上或是传播意识形态，都是帝国主义的，在这些情况下，这些努力对于那些希望维护他们自己制度的国家而言就是帝国主义行为。^②

冷战之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使文明作为一个分析层次受到广泛关注，阿隆在之前很早就考虑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大国在决定是否帮助一个小国时并不是考虑小国是否和自己属于同一种文明，而是考虑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文明冲突论并不符合经验现实。与文明冲突论相似，人们担心冷战期间不同意识形态会导致意识形态战争，但阿隆很早就提醒人们，国家在决策时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阿隆对中苏分裂有深刻认识，认为意识形态近似并没有阻止中苏两国分裂以至最后敌对。同样意识形态不同也不应该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合作的障碍，美国卷入越战是因为很大程度上没有深刻理解这个问题。

阿隆虽然没有提出结构理论，但他认为战争发生主要原因的观点与结构主义观点类似，他认为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体系稳定不可逾越的障碍，“千百年来，国际关系的稳定主要来自于各国相对实力的此消彼长，这种此消彼长在最近两个世纪受到人口与工厂的数量和主权权威的影响，（国家）发展的速度直接决定了外交体系的格局”。^③

阿隆指出要实现普遍和平只有两条道路，或是通过法律或是通过帝国。通过法律就需要有立法者，但如何分配投票权将会面临着问题，民族国家不会轻易将自己的命运交予超国家机构来决定，在关键时刻不会放弃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要使国家放弃自决权只有通过暴力，霸权稳定论认为帝国内部可以实现有限和平，如果出现一个世界帝国就可以消除国家间冲突，但历史表明还没有哪个

①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p.290.

②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p.278.

③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p.274.



国家可以成为真正的世界帝国，在大国拥有核武器之后，世界帝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出现，通往普遍和平的另一条道路也不可行。阿隆认为只要存在“他者”就有矛盾，就存在政治，因此就有战争，只有所有人变成“我们”时战争才会消失，而这在当今世界并不可能，所以战争现象将在相当长时间里继续存在。

（三）工业社会与战争

阿隆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敏锐地观察到工业革命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不仅对各国国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也影响了国际关系，这其中既有有利一面，也有消极一面。工业革命使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战争破坏力变得极大，平民的伤亡大幅增加，传统战争法则被逐渐颠覆，阿隆将这种战争称为“总体战”。

工业化也有利于和平的一面，它促进了国家之间交往，增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阿隆认为工业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力量，逐渐弥合冷战中由意识形态造成的分歧。工业化促进了工业社会的形成，不管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如何，工业社会总是呈现相似特征：城市化、雇佣劳动化、分工细化和资产阶级化。^① 这种现象被称为“趋同论”（convergence theory），各个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都面临着工业社会带来的同样问题，这可能成为不同国家合作的基础。趋同论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革命为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改善在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机会，运用新技术将会提高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后发优势使它们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样由于贫富不均导致的南北冲突就有机会减少。

工业革命作为一种社会革命的催化剂对 20 世纪影响尤为深刻，阿隆指出是工业技术而不是政治民主，使“一战”这样无限和无情的战争成为可能，使它不像以前任何一场战争。工业技术动摇了长久以来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鼓励了城市中大众对自己谦卑状态不满，使原本作为上帝或自然意旨的贫穷变成了丑闻。工业革命启蒙和激发了亚洲乃至其他地方的反西方革命。^②

热核武器也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它的破坏力使人们第一次开始怀疑战争是否仍然是政治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因为热核战争可以消灭政治本身。和平主义者寄希望于热核武器带来的“恐怖下的和平”，这也是美国早期“大规模报复战略”的逻辑基础。阿隆认为热核武器并没有改变国际关系的性质，热核武器也可能被使用，这间接地为“灵活反应战略”提供了思想基础。阿隆认为核武器并没有使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断言过时。^③

三、阿隆的国际关系认识论与方法论

认识论限定了方法论的范围，阿隆的国际关系认识论既受到早年法国社会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影响，也受到后来在德国所接触的历史主义影响，阿隆对这两种认识论之间的区别进行过深刻思考，所以他的认识论思想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这其中的一些思想与我们当今国际关系认识论中的很多争

① [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8-139 页。

② Raymond Aron, *The Century of Total War*,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164.

③ Raymond Aron, *Clausewitz, Philosophy of Wa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5, p.337.



论有关，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

（一） 国际关系认识论

法国的社会学研究具有实证主义传统，阿隆早年也接受了这个传统，这种传统认为通过理性研究社会，可以得出和自然科学同样可靠的结论。但阿隆后来接触到的历史主义却反对这种主张，而是认为社会文化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本质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传统不适合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有其独特之处，其表现在（1）经济学、社会学与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世界，要了解这个世界需要参考人的意识概念，没有“意识”概念就没有意义。社会建构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意义的建构，这并不是否定社会规律的存在，而是为这些规律加了限制条件，认为这些规律必须参照有意义的人类行为。（2）人类不同共同体之间可以相互理解，但前提是他们之间存在共同点。（3）研究者价值的多元化对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选择有影响。^①

因为受到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共同影响，阿隆的国际关系“理论”观介于传统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的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中（第二次论战），阿隆是个折中主义者，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事件，但这种理论无法达到经济学综合的程度，理论做出各种外交系统的模型，在综合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境，模仿经济学理论描述危机或失业的模型，但是由于外交行为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同时具有多种不同目标，所以国际关系分析不能发展出更包容性的理论。^②

与自然科学理论不同，阿隆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功能有限，因为预测结果会通过预期和现实相互作用，改变原来的预测结果，“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设计可能产生的国际系统，却不能宣告某一系统出现，更不能确定时间”。^③

（二） 国际关系方法论

自卡普兰将系统论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后，系统论就被国际关系研究广泛使用，阿隆认为卡普兰等将国际系统分为两极、多极、单极等模型的做法并没有多大意义——“雅典和斯巴达，如果我们拿这个例子与两极世界相比，那么两者之间会有很多不同的变量，我不敢肯定这类比除了比较性的描述之外还能给出什么东西，我不敢相信它能产生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命题”。^④

阿隆提倡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是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类似情境，但理论只有和具体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对具体事件才可以深刻理解，重要的是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理解，而不是验证理论，阿隆的这种方法论主张得到许多当代国际关系学者的响应。^⑤

20 世纪后半期对国际关系变量的量化和建立数据库在美国逐渐盛行，这个潮流最早表现在昆

① [法]雷蒙·阿隆：《论治史》（冯学俊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242-249。对法国社会科学的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哈耶克曾专门批判过（《科学的反革命》），阿隆曾详细地讨论了哈耶克的批判，他赞同哈耶克的大部分看法。

②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p.17.

③ 雷蒙·阿隆：《论治史》，第 367、473 页。

④ 雷蒙·阿隆：《论治史》，第 383 页。

⑤ 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历史社会学”方法重新关注见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Hobson eds.,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西·赖特的战争研究中，阿隆从来没有被这种量化的努力说服，他认为在统计战争伤亡的数据中，谋杀者与被杀者“意义”不同，虽然结果都是人员伤亡，但如果忽视谋杀者与被卷入战争的不同导致事件意义的不同，客观与量化的方法就使自己失去了信誉，^① 每个事件意义的不同使建立数据库的各种努力成为徒劳。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主张从个人或国家的意图和动机来解释历史事件，这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自系统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广泛使用后，系统论所使用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逐渐占有重要地位，阿隆在这两种方法中倾向于前者。阿隆不赞成系统论及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还源于他的哲学思想，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往往得出决定论的结论——某种结果的出现是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阿隆不赞同这种哲学主张。他认为历史发展中没有什么必然的，有的只是某个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大于另一可能，但可能性始终存在，不同的只是不同事件出现的概率不同，阿隆将此称为“或然决定论”。^② 承认其他事件可能，为个人决定留下了空间，也为道德判断留下了空间。

四、阿隆的国际关系伦理学说

历史主义在伦理学上的逻辑结果是道德相对论、道德怀疑论。阿隆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得出鲜明历史主义特征的结论，这些观点在法国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它挑战了当时法国大学占支配地位的哲学传统，所以受到各方面怀疑。^③ 阿隆从来都没有承认自己在道德上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或怀疑主义者，但他的哲学可以很自然地推导出这个结论：如果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的诸多解释之间没有实质区分，这些解释背后的价值之间没有等级优劣之分，则所有“客观历史”的说法都很可疑，认为某种价值至高无上，以此为理由要求别人服从和牺牲就是错误。

阿隆清醒地认识到德国历史主义者“强权政治观”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现实主义者，但他并没有沦为一个愤世嫉俗者。阿隆不认为国家间必然是永恒的战争状态，历史主义也有利于和平的一面，只要每个国家都能相互妥协，政治家在决策时审慎，而不是认为自己掌握了世间唯一真理，历史主义也可以发挥创造和平的作用。就像伯林指出相对主义有利于国内政治一样，在国际关系中，不同民族信奉不同价值，没有凌驾于这些价值之上更高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些价值的优劣，所以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保持自己特色、尝试独立发展的权利，将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区别消灭只会使人类贫瘠，即使这个目标可以达到。^④

阿隆将其国际关系学分为四个部分：理论、社会学、历史与实践（Praxeology），其中“实践”讨论的就是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问题，在这点上阿隆承认受到马克思·韦伯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影响。个人可以坚持原则，保持良心安宁，但一个进入公共生活的政治家在国家危机时刻的公民却不可以如此，他只能根据具体历史环境做出判断，判断的依据不是某个行为是否符合某种不变信念，而是

①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p.307.

② Raymond Aro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pp.254-264; 陈喜贵：《维护政治理性——雷蒙·阿隆的政治哲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雷蒙·阿隆：《论治史》，第453页。

③ Kerry H. Whiteside, “Perspectivism and Historical Objectivity: Maurice Merleau-Ponty’s Covert Debate with Raymond Aron”, *History and Theory*, Vol.25, No.2, 1986, pp.132-151.

④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p.751.

这个行为是否维护了国家安全，增强了国家实力和荣誉。他认为政治家应该谨记制衡修正主义国家或革命国家是维持国际社会稳定的条件，如果他忽视了对相对实力的考虑，他就没有尽到责任义务，没有服从他的职业道德。^① 这种伦理学说表现在阿隆对 20 世纪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上，如去殖民化和意识形态冲突等。

（一）“阿尔及利亚的悲剧”

“二战”动摇了法国的殖民帝国地位，战后，法国试图用新方法重组殖民帝国，如尝试给殖民地居民以法国公民权、给予殖民地自治、成立“法兰西共同体”等，但正如戴高乐所指出，这些调整目的是为了“排除殖民地有任何脱离法兰西集团自治的思想，即使在将来，也要摒弃在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的设想”。^② 法国政策在印度支那、摩洛哥、突尼斯相继失败，但这些都及阿尔及利亚独立对法国的影响，它导致了法国社会严重分裂。

阿隆 1957 年出版的《阿尔及利亚悲剧》在法国产生很大反响，其主旨就是论述阿的独立不可避免。阿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对法国而言并不是一场灾难。^③ 但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当时多数人赞同：右派同意他的理性分析，却不同意“让阿独立”的结论；左派则反对他的“理性分析”——他们认为在阿独立的问题上，道德推理应该比理性分析更重要。阿隆解释他的书中为什么没有考虑道德因素，只考虑经济要素时说，他的目标是劝服右派，对右派来说道德说教行不通，只能以利益权衡来说服他们。^④ 但阿隆无法说服他们，这是因为对右派来说经济理由至多是个借口，独立对右派来说在道德上不可接受，它关系到法国的国家荣誉——这是法国重拾在 1940 年和 1954 年丧失荣誉的机会。

阿隆的结论受到左派欢迎，但他对道德谴责的忽视却激起了更大反对。他说之所以没有在《阿尔及利亚悲剧》中使用意识形态语言，原因在于对殖民主义谴责的话已经有很多人说了，但这并不表明他同意左派对殖民主义的谴责，尤其是萨特为反殖民主义暴力所做的辩护。^⑤ 阿隆劝告人们阿的独立已不可避免，用的却是最不受欢迎的理由。他在殖民主义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心理，这种心理来源于法国民族利益与普世主义之间的冲突，他担心反殖民主义和反西方成为同一个运动，而苏联正在利用这一运动。另一方面阿隆多少也相信“法兰西使命”，认为法国有促进不发达地区发展的义务，有促进文明的使命——可是，正如萨特所说，“你可要明白人家并不是谴责我们背叛了什么使命：正因为没有什么使命。受到质疑的就是宽宏大量本身；高唱这个字眼只有一个含义：给予的身份。对面那些脱胎换骨和解放的人认为，无人有权和有特权给予任何人什么东西，大家各自享有所有的权利”。^⑥

①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p.609; [法]雷蒙·阿隆：“马克思·韦伯和实力政治”，《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88-705 页。

② 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会议的讲话，见吴秉真、高晋元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3-255 页。

③ Raymond Aron, “The Algerian Tragedy”, in Raymond Aron, *The Dawn of Universal History*, New York: Perseus Books Group, 2002, pp.424-452.

④ Raymond Aron, “Decolonization”, in Raymond Aron, *Thinking Politically*,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97, p.160.

⑤ 萨特在弗朗茨·法农著作上的著名序言：“造反在最初时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这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见弗朗茨·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兵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序言第 24 页。

⑥ [法]让-保罗·萨特：“序言”，见《全世界受苦的人》，第 28 页。

（二）意识形态斗争

阿隆认为意识形态是一整套关于起源与最终目标的体系，自以为无所不包，既能评断现在，又能预知未来，他有时也将意识形态称为世俗宗教。阿隆反对意识形态斗争，认为人们各自拥有不同的终极价值，却没有裁决这些价值优劣的标准，以别人放弃价值为目标的战争不是理性做法。任何人都不能把从自己对事件的解读中任意推演出来的意义强加到别人的行为或思想上，不应对自己的对手妄加评判，好像自己的事业与终极真理是一回事。^①阿隆更早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主张，这种主张既是立足于对工业社会的观察，也是为了实现国家间有限和平合作的一个道德建议。

现实主义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为特殊利益做的一种辩护，只是一个口号，如果将其当真，甚至以意识形态为国家目标，则会将国家引入类似“十字军东征”式征伐中，最终危害国家利益。阿隆反对“十字军东征”式战争，也不同意新哲学家（New Philosopher）从意识形态角度对苏联进行的批评，^②但他与其他现实主义者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认为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一种虚构，一国国内政治制度性质如何也很重要。^③

阿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主要针对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他认为苏联的官方学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和平的障碍，却没有指出西方“自由世界”的提法同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这一提醒在冷战之后，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对他国内政进行大肆干涉时，更显必要。他说和平的保证是苏联放弃它思想中“最终真理”的部分，但是如果一种意识形态没有了普遍有效、最终真理的成分就不是“意识形态”了。最好的做法还是遵从阿隆自己的建议，不是试图永久地消灭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是要学会共存。

五、结论

历史哲学是阿隆政治思考的起点，阿隆试图回答的最重要历史哲学问题是“能否得到客观的历史”，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因此他是个历史主义者。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并不存在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这样的东西，只有德国人的历史、法国人的历史和苏联人的历史等，“世界史”只是不同文明历史的拼凑，这其中缺乏将人类统一起来的东西。工业革命第一次为人类提供了联合的基础，阿隆认为这个基础仍很脆弱。^④

和平主义者试图将战争现象消除，阿隆认为这个目标不切实际，利益与价值的分歧为国际冲突提供了可能。但分歧并不必然导致冲突，我们可以减少战争发生的机会和破坏性，这要求我们都抱有怀疑精神，任何时候不要自以为（或认为其他人）掌握了世间的最终真理，为宽容和妥协留下机会，这是实现有限和平的唯一路径。

[责任编辑：吕海]

① [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② New Philosophers 指的是法国1968年之后从左派阵营中分裂出来的反马克思主义一些知识分子和哲学家，这些人从拥护马列主义转向极端的反马列主义，阿隆认为他们对苏联的批评很肤浅。见[法]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第407-408页；Raymond Aron, “Introduction,” in *In Defense of Decadent Europe*, Translated by Stephen Cox,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6, p.5.

③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p.599-600.

④ Raymond Aron, *The Dawn of Universal History*, pp.463-486.



社会网络、结构分析与国际关系

——评《国家的网络：国际网络的演变、结构和影响，1816-2001》

陈冲*

内容提要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近年来开始被广泛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齐伟·毛兹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提出了关于国际关系演变的“国际政治网络”理论。他将国际关系视为一系列冲突与合作网络互动的结果,通过探究这些网络的形成、变化以及互动,对国际关系提出了全新的解释。这一理论从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出发,综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核心假设,提出“国家的战略参照组”(SRG)的能力和结构对国家层次、双边层次、体系层次上的国家行为和过程的具有显著影响。毛兹的理论不仅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注国家属性和特征对其行为的解释框架,而且通过分析网络结构和行为体的位置的影响,丰富了社会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国际体系 网络结构 战略选择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生活的“复杂性”(complexity)常常被认为是理解国际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关键问题。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设计解释模型、发展相关理论来简化这些复杂性,了解它的特性,进而探究它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对国际关系现实的理解,而且也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可以说,简化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的动机直接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在新近出版的《国家的网络：国际网络的演变、结构和影响，1816-2001》^①一书中,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政治学系教授齐伟·毛兹(Zeev Maoz)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关于国际网络形成和进化的“国际政治网络”(Network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IP)理论。在该理论中毛兹将过去两个世纪复杂的国际关系演变进程看作是国家之间存在的一系列诸如合作与冲突等互动网络演变发展的结果。他通过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方法检验了国际体系作为一种复杂的互动网络的形成、演变和影响。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第一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专著,全书视角新颖,论证清晰,不仅补充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一系列经典国际问题的回答,而且拓展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空间,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理解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受哈佛大学学者哈里森·怀特(Harrison

* 作者简介:陈冲,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

① Zeev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6-2001*(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White) 等对社会结构的数学模型研究的推动而得到广泛运用。它不同于传统的类别属性研究路径,而是通过将社会关系视为一种持续的互动模式(即社会网络),着眼于行为体的位置及相互关系。^①除了在传染病、物理、数学、生物以及计算机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外,社会网络分析也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组织研究、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然而奇怪的是,在政治学领域特别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路径的研究并不多。^②那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同样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吗?如果回答是,那么如何运用这种方式科学地研究国际关系,它与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路径有何不同?

面对这些尚未明确回答的问题,在政治学学者包括国际关系学者里面,既有支持者,也有怀疑者。正如在之前国际关系领域的任何新颖的范式一样,国际网络的研究也受到了许多的怀疑。人们使用“网络”这个术语,但却没有领会其要义。一些学者并没有理解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与系统研究国际结构和过程之间的关联性。另一些学者可能明白社会网络分析的某些方面,但却将其局限为一种方法论或者测量关系的方式。^③然而,国际关系是关于“关系”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者对于“网络”一词并不陌生。例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核心概念“相互依赖”,关注的就是国家之间的关系网络以及它们是如何塑造现代国际关系的关键特征和国家的行为。^④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却并没有意识到通过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国家之间的网络关系,而大多停留在“网络”这一术语的使用上。面对国际关系的经验现实和学术研究的差距,近年来一大批学者开始相信社会网络分析路径适合国际关系的研究,并着手探究如何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国际关系。

在社会网络理论看来,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通过一定的联系形成了特定的国际网络,行为体(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就是网络中的“点”(nod)，“联系”(tie)界定它们之间互动的“规则”(rule)。国际网络包括不同的形式,既有合作网络,如安全同盟、贸易网络、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国际组织网络、外交关系以及文化网络等;而冲突也同样可以被视为在网络中的行为——国家A与国家B的冲突可能招致A或B的盟友也卷入其中。这些网络涵盖了国际体系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维度,行为体在这些不同的维度上互动;与此同时,这些行为体本身也包含不同的制度、社会群体或官僚机构,包含着复杂的结构。因此,对这些复杂结构的科学研究需要一种一般化的网络理论。

然而,既有的社会网络理论除了结构社会学家对世界体系理论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之外,

^① Stacie E. Goddard, “Brokering Change: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2, July 2009, p.254.

^② 关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近年来在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评述可参考: Emilie M. Hafner-Burton, Miles Kahler, and Alexander H. Montgomery,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3, No.3, Summer 2009, pp. 559-92; 陈冲、刘丰:《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第92-111页。

^③ 陈冲、刘丰:《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第94页。

^④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并没有关注国家层次的网络结构和影响。^① 在世界体系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主要探究的是系统的影响,而对于系统的结构、稳定性和演变原因的探究很少,这样我们关于国际网络形成、演变、互动及其影响知之甚少。国际关系学者则将国际体系视为一系列彼此互动的国家,这种互动受到特定结构下的一系列规则的管理,最重要的两个变量是大国的数量和国家之间权力的分布。尽管这两种路径对国际结构是如何影响不同层次的行为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它们对于国际体系在何时、为何以及何种条件下发生变化并没有提供有效的经验检验。^② 基于这些研究不足,本书提出了国际政治的网络理论。这种理论关注国际关系作为一系列相互联系和互动网络的演变。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显示,本书主要探究这些网络是如何形成演变的,它们如何塑造了国际结构、网络中的行为体如何互动,网络之间的互动及其影响。

二、国际网络形成和进化的理论

在毛兹看来,国际网络的出现是国家与其它国家形成或中断联系的选择结果。NIP 理论就是关注这些网络的进化和演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国家领导人和政策精英最关注的是什么?他们如何应对国家面临的挑战?毛兹认为,在无政府世界中,对自身安全和生存的关注是国家恒久不变的使命。这种安全关注来源于它们的外部环境和过去的冲突经历。由于许多国家都无法单独凭借自身的权力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因此它们需要同盟来制衡敌对的国际环境。国家之间的同盟形成了一种合作性网络,国家对同盟的选择界定了安全合作网络的结构,并将其“外溢”(spill over)到其它的合作网络之中,这些网络包括贸易和制度网络,从而不仅影响了网络中的行为体的互动行为和过程,而且共同塑造了国际关系的演变。

(一) 核心变量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提供了一套分析国际网络特征的独特工具。^③ 作为社会科学结构分析著作,毛兹通过四种网络结构的指标——密度(density)、传递性(transitivity)、

^① 例如 Ronan Van Rossem, "The World System Paradigm as General Theory of Development: A Cross-National Tes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No. 3, June 1996, pp. 508-527; David Snyder and Edward L. Kick, "Structural Position in the World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 1955-1970: A Multiple-Network Analysis of Transnational Intera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4, No. 5, March 1979, pp. 1096-1126.

^② 在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主编的《网络政治》介绍了关于网络分析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行为体”两种研究路径,参考 Miles Kahler, *Networked Politics: Agency, Power and Governa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本书第二章详细讨论了本书所用到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概念和测量方式,参考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chapter 2。更多关于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的讨论可参考: Peter J. Carrington, John Scott, and Stanley Wasserman, *Models and Method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Stanley Wasserman and Katherine Faus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这三部著作同为剑桥大学出版的“社会科学的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 32 部结构分析专著。



极化 (polarization) 以及相互依赖 (interdependent)^①——追踪了 1816-2011 年以来的安全同盟网络、国际组织网络和贸易网络的演变及相互影响。这四种指标既反映了国际网络的特征, 又构成了分析网络之间相互影响的基础。毛兹认为, 国际网络结构的影响是双向的, 网络结构既影响了行为体的战略选择和行为, 反过来, 行为体的战略选择和行为又会对国际网络的结构产生影响。

毛兹关于国际网络的形成和演变的国际政治网络理论建立在国家的战略选择这一微观基础上。为了更好地界定国家的战略环境, 他创造了一个关键概念: 战略参照组 (Strategic Reference Groups, SRG)。SRG 指的是影响外交政策精英们对于国家安全挑战观念的国际环境, 它关注的是国际环境中的一组国家 (或非国家行为体), 决策者认为这些行为体在特定的时间点对威胁或机会的本质、重要性和程度产生即时的、直接的和深远的影响。^② 这个概念构成了国际网络理论的基础。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术语来说, SRG 就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自我网” (security-related egonet)。在国际体系中, 安全是国家永恒关注的目标, 它促使国家找出对其安全的实际或潜在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对国家价值或资源的威胁或者获得其他资源的机会。因此, 决策者会收集制定政策需要的相关信息, 在理论上, 任何关于国家外部环境的信息都可以被视为与政策制定相关。但是在实际中, 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范围比较有限——并非世界上的所有行为体或事件都与其安全相关。同时鉴于国家的情报收集资源有限, 国家必须将目标锁定在有限的国家, 这些国家被认为与国家的安全相关。这些目标国就是国家的“战略参照组” (SRG)。构成 SRG 的成员被认为对“焦点国” (focal state) (即网络中的“自我中心”国) 的安全具有潜在或实际的影响。^③ 但是, 哪些国家构成了焦点国的 SRG 呢?

毛兹认为,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概念上很容易达成一致,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操作。尽管如此, 他认为通过将概念定义转化为可以观测的操作定义却是可能的。毛兹通过两个指标对这一概念进行操作: 首先, 他利用“国际环境的政治相关” (Politically Releva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RIE) 概念界定了 SRG 的地理观点。PRIE 很好地界定了国家之间的战略相关性, 尽管主要是在地理环境上; 其次, 在 PRIE 基础上融合 SRG 的功能特征, 如过去的冲突、竞争对手。在此基础上, 毛兹将 SRG 放在了更为广泛的国际冲突的意愿—能力 (opportunity-willingness) 框架中。这种框架认为, 国家之间的战争主要是因为国家具备极高的动机 (意愿) 和机会。机会主要通过国家的地理邻近性操作, 而意愿则常常以国家之间先前的敌人或竞争对手, 或者与国家敌人先前的战略联系操作。随后, 毛兹将这 SRG 转化为社会网络分析中的自我网概念。网络中特定点的自我网是指与改组拥有直接联系的一组点, 战略参照网络便根据近规则“i 与 j 具有战略相关意义”定义, 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政策相关网络 (politically relevant networks) 和战略相关网络 (strategic reference networks)。

① 对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相关概念介绍可参考约翰·斯科特:《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第二版), 刘军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111.

③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115.



（二）理论架构

SRG 构成了国家安全政策的微观基础，同时构成了毛兹的国际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在对 SRG 进行操作定义后，毛兹开始建立它关于国际网络形成和演变的理论。他的理论融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文化范式的核心假设。毛兹首先以现实主义理论关于国际非合作行为假设作为国际政治网络理论的基准模型（baseline model），吸收了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权力的观点。他认为：（1）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主要关注国家的生存和安全，（2）确保安全的最终方式是最大化国家权力，同时（3）国家对他国的意图存在本能上的怀疑。在进一步建立 NIP 理论之前，毛兹利用他所建立的国际冲突数据检验了 SRG 的效度和基于现实主义的假设。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SRG 确实对国家行为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且存在很高的建构效度。然而，作为基准模型的现实主义观点的解释力却在 8%-25% 之间，这并不算高，这意味着还有更复杂的因素没有被挖掘出来，因此需要呼唤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其他解释。如果融合后两种模型，NIP 叠加在一起的解释力提高了，那么 NIP 理论就会更加完善和更具解释力。

在随后的理论建构中，毛兹正是沿着这条思路进行 NIP 理论建构的。他进一步分析了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国家行为选择的分析，将 NIP 理论从非合作网络扩展到合作性网络。在现实主义假设的基础上，毛兹又添加了建构主义关于国家认同效果的假设，即（4）国家的认同影响它对国际环境的看法。同时，根据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他修正了（1）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认为尽管国家本能地怀疑其他国家意图（3），但这种怀疑可以被（a）共同的利益；（b）共同的认同和（c）过去友好的互动经历所修正。^①

根据这三种视角形成的 NIP 理论是如何影响国际网络的形成呢？首先，国家根据其 SRG 的总能力决定了安全威胁的严重程度，如果 SRG 的实力超过了焦点国的实力，那么焦点国就需要同盟来补充自己的实力。三大理论对此的解释是一致的。但 NIP 理论认为，合作的价值不仅在于积聚资源反制衡共同的安全威胁。换言之，国家试图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信任、减少怀疑，进而产生广泛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从而增加它们的安全。成功和互惠的合作经历有助于减少未来的威胁，与此同时，也有助于在这种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中形成集体身份。其次，合作具有外溢效应，它可能从安全同盟网络中扩展到经济、制度合作中，从而形成经济网络和组织网络，反过来，在经济网络和组织网络中的何种也有可能增加安全合作的前景。^② 如此，NIP 理论又解释了不同网络之间的互动及相互影响。NIP 理论建立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上，据此梳理如下关于国际网络形成、演变和影响的机制，见表-1。在此基础上，毛兹提供了一个分析国际关系演变的“国际网络理论”。

^①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179.

^②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181.



表-1 国际网络形成与网络结构

问题	现实主义范式	自由主义范式	建构主义/文化范式
1. 网络形成的国家基础			
(1) 国家为什么选择安全合作	积聚资源以平衡它们的 SRG 的挑战（机会或威胁）	积聚资源以平衡它们的 SRG 的挑战	1. 积聚资源以平衡它们的 SRG 的挑战 2. 文化相似国家共同身份的一种表达
(2) 国家如何界定安全挑战（威胁或机会）	通过它们的 SRG 规模和总实力	通过它们的 SRG 规模和总实力	1. 通过它们的 SRG 规模和总实力 2. 通过焦点国家与它的 SRG 成员国的文化差异
(3) 国家何时可能寻求盟友？	1. SRG 与它们的焦点国家实力差异越大 2. SRG 的成员越多	1. SRG 与它们的焦点国家实力差异越大 2. SRG 的成员越多 3. 对民主国家而言，体系中的民主国家越多	1. SRG 与它们的焦点国家实力差异越大 2. SRG 的成员越多 3. SRG 成员之间的文化相似性越低
2. 双边网络形成过程			
(4) 哪些国家可以成为同盟候选者（按照重要性降序排列）	1. 敌人的敌人 2. 非 SRG 成员	1. 民主国家与其他民主国家 2. 拥有合作历史的非 SRG 成员 3. 敌人的敌人	1. 文化上相似的国家 2. 民主国家与其他民主国家 3. 拥有合作历史的非 SRG 成员 4. 敌人的敌人
3. 网络之间的影响			
(5) 环境条件是否影响同盟寻找的模式？	否：无政府状态一直存在，这些条件不因时间变化而改变	是：随着 SRG 的相互依赖和制度化加深，对安全同盟的需求会下降	是：根据洛克文化的 SRG 可推导出与现实主义相同的预期；康德文化的 SRG 可推导出与自由主义相同的预期
(6) 战略考虑是否影响贸易模式？	是：战略商品的贸易限于同盟和非 SRG 成员 其他商品贸易不受安全考虑的影响	最初是。随着时间变化，贸易模式受经济考虑影响	在洛克文化的 SGR 中是，在康德文化的 SGR 中不是
(7) 其他类型的网络关系是否影响安全网络？	否：安全网络独立于国际关系的其他维度	是：经济和制度合作导致同盟的形成模式不同，并秉承超出制所需要的大量同盟	是，经济和制度网络会社会建构了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同盟在文化上越来越不同



(8) 这些考虑对其他网络有何影响?	战略贸易网络: 同盟和战略贸易网络倾向于重合。一般贸易或组织网络中不存在这种重合	在同盟、贸易和组织网络中存在双向的外溢效应	在同盟、贸易和组织网络中存在双向的外溢效应。随着时间变化, 同盟在文化上越来越不同
4、系统影响——国际网络的结构特征			
(9) 出现什么类型的同盟网络	极化的——倾向于两极	最初是极化的, 但是随着时间变化, 极化会下降	1. 洛克文化: 极化与文化一致 2. 康德文化: 极化下降, 聚类关系与文化相似出现差异
(10) 在同盟聚类或块中, 决定国家成员的因素	1. 战略因素 2. 影响聚类和块成员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不会随时间而改变	1. 聚类或块成员最初由战略因素决定, 但是随着网络的成熟这种影响会减少 2. 在成熟网络中, 自由主义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加	1. 洛克文化: 战略和文化因素决定了聚类或块成员 2. 康德文化: 自由主义
(11) 不同网络中成员的重合	1. 在同盟和贸易网络中重复 2. 其他网络无法预测	1. 在同盟、贸易、IGO 网络中重合 2. 文化网络无法预测	由于文化归属决定, 所有网络成员出席重合

表格来源: Zeev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6–200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77-178.

(三) 理论检验

根据表-1 关于网络形成、演变和影响理论观点的总结, 毛兹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提供的分析工具和概念, 以同盟网络、贸易网络和国际组织网络数据在随后的章节中分别检验了 NIP 理论的核心观点及其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毛兹在本书关注的是过去近 200 年国际关系的演变, 所利用的数据跨度时间特别大, 这些网络在长时段里是否是一种稳定方式演变时, 他假设每一年都会提供一组新的网络,^① 因此在检验 NIP 理论时, 毛兹主要采取横截面时间序列分析 (Time Series Cross Sectional Analysis) 方法。作者在第六章中主要通过检验国家在何时、为何以及如何形成同盟、国家选择何种同盟证实了 NIP 理论关于网络形成的假设。同时, 通过研究同盟网络与其他网络成员身份的重叠性检验了网络的“外溢”效益和对国际冲突的影响, 从而证实 NIP 理论关于网络演变和网络结构影响的假设。

在随后的章节中, 作者检验了 NIP 的影响。第七章主要关注影响国家在不同网络中的地位和威望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国家行为 (冲突和战争) 的影响。值得说明的是, 毛兹对国家地位和威望的测量主要依据的是网络的中心度 (centrality)。这为国际关系中关于国家

^①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101.



地位研究提出了一种可靠的测量指标。在第八章中，毛兹重新检验了民主和平论的悖论（democratic peace paradox）——民主国家很少爆发全面战争，并且也很少爆发短期的军事冲突，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具有同样的冲突倾向，如果民主国家之间不相互打仗，那么随着国际体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体系中的程度应该减少，但是大多数经验研究并没有表明这种关系。毛兹居于 NIP 理论认为，民主化只有在 SRG 成员之间提高时才具有显著影响。在第九章中，毛兹则考察了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和战略关系对国际冲突的影响，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他分别综合了敏感性依赖和脆弱性依赖的影响。^① 在第十章，毛兹则修正结构社会学家关于世界体系研究的不足，第十一章则检验了不同网络在国际体系中互动行为，在体系层次检验科 NIP 理论关于网络结构的影响。

总体而言，毛兹通过对同盟网络、贸易网络、文化网络和国际组织网络提供的数据检验了 NIP 理论的核心观点，进一步表明 NIP 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影响。

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

在本书中，毛兹成功地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通过将过去两个世纪国际关系的进化视为一系列互动的网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范围。总体而言，本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具有以下贡献：

第一，从理论视角看，毛兹提出的关于国际网络形成与进化的 NIP 理论综合了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核心假设，为理论范式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了新的范本。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三种主流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既存在明显的不同，但也存在相似的观点，在解释国际行为和现象时，具有对话的基础。正如关于国际网络形成的假设中，从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合作出发，我们看到三大理论均认为国家选择安全合作的动机是为了积聚资源以制衡 SRG 的挑战。随后的一系列假设和观点，更多地展示了三大理论之间的相互补充。在此意义上，NIP 理论代表了三大理论综合的理论成果。

第二，从研究思路上看，毛兹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路径将着力点放在国家的属性研究上，而是将从国家之间关系所形成的结构入手，探究网络的结构形成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毛兹的分析基础建立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之上，而社会网络分析就是一种研究社会互动关系的结构分析方法。从结构因素出发，国际网络的密度、极化、相互依赖以及传递性不仅对国际体系的民主化程度、战略关系和依赖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在体系层次上对国际

^① 关于本章的研究也可以参考 Zeev Maoz,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cross Levels of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3, No. 1, January 2009, pp. 223-240.



体系的稳定发挥影响。这种结构分析方法，强调的是网络成员的位置及其关系，如在第十章世界体系研究中，毛兹发现网络成员的结构相似性（Role Equivalence）对其生产模式和增长模式的影响远远大于国家本身的实力、民主程度的影响。^① 不过，强调结构分析并不意味着社会网络分析忽视行为的属性，事实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将行为体的属性、关系和结构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

第三，本书基于不同的分析层次突出了 NIP 理论，并在不同的层次上对该理论进行了经验验证，很好地解决了国际关系乃至社会科学中的“分析层次”问题。分析层次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国际关系研究。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两方面：一是这个问题经常以定义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形式提出，即行为体的行为是由国际体系的结构所致还是单位体的选择和行为聚集的结果。在实际研究中，需要研究者常常用高层次的数据推测低层次的行为，从而容易导致“生态学谬误”（ecological fallacy）的出现。^② “生态学谬误”是指将高层次的信息、经验、发现应用到低层次的分析单位上。如果研究理论是建立在个体层次上的，而利用高层次的汇总数据（Aggregate Data）作为对个体层次理论的根据，就有可能犯了生态学谬误。例如在关于内战的研究中，对穷国更容易发生内战的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由于在这些穷国中有更多低收入青年，在无法找到另一种更好的工作时，他们愿意加入到“叛乱群体”中。根据这种观察而得出中青年中的低收入者更有可能加入到“叛乱群体”这一结论很可能就犯了“生态学谬误”，因为所得到的是汇总数据，它观测的是高层次的总体收入的平均值，并不是个体数据，因而它所显示的“汇总关系”并不必然能够解释低层次上个体青年收入对其加入“叛乱群体”意愿的影响。^③

从另一方面来看，分析层次既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许多经验研究，特别是关注于国际冲突的原因和影响的研究揭示出一个经验层次上观测的结果与另一个经验层次上获得的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性。本书在处理不同分析问题时，借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很好地避免了这个问题。毛兹认为，如果行为体的根源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这种结构特征的性质就可以用国际网络的属性（极、密度、中心度等）来测量。这些属性然后可以用来预测单位体的行为和属性。同样，如果我们认为因果箭头是从行为体的属性和选择指向体系的结构，那么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将体系结构视为一个“突现结构”（emergent structure），

^① 在之前的研究中，毛兹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结构对等性”（Structural Equivalence）概念探究了行为体的位置对冲突行为的影响，参考 Zeev Maoz, Ranan D. Kuperman and Lesley Terris, “Structural Equival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0 No. 5, October 2006, pp. 664-689.

^② 加里·金（Gary·King）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法，参见 Gary King, *A Solution to the Ecological Inference Problem: 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 Behavior from Aggregate Dat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参见 Jan Ketil Rød and Halvard Buhaug, “Civil War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with the Use of Local Indicato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SA’s 49th Annual Convention, Bridging Multiple Divides, Hilton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CA, USA, Mar 26, 2008.



然后用这些单位的属性来研究网络整体的属性和过程。^①

第四,从研究方法上看,本书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科学特征,无论是在研究问题的提出、理论框架的构架,还是在假设检验过程中的变量操作化,统计结果的解读等,均遵循了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在检验 NIP 理论的相关假设中,毛兹依据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任何一个结论都是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而得出。正是由于这种严谨,本书提出的 NIP 理论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此外,作者的分析也很好地回应了国际关系领域所谓的“分析方法问题”。^②毛兹关于网络形成和演变的理论通过检验同盟网络、贸易网络、军备贸易网络、文化网络、国际组织网络等进行验证。这些网络提到了多种检验数据,基于此,毛兹的国际政治网络理论得到了强有力的检验。此外,鉴于社会网络分析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经验数据测量上——毛兹受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启示,还涉及了许多适合分析国家关系特征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分析网络数据的软件。^③

总之,毛兹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国际关系理论传统视角出发,提出了国际网络形成和演变的 NIP 理论,并系统地检验了该理论对国际体系和过程的影响。全书视角新颖,结构严密,不失为国际关系的结构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领域的一部佳作。

四、网络分析有待深化拓展的议题

尽管毛兹在书中试图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试图对国际关系的进化提出新的解释,但无论是在理解建构还是在假设检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尽管毛兹提出了解释网络形成和演变的 NIP 理论,但正如前文所述,NIP 理论的所有命题均来自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毛兹声称他的 NIP 理论综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的观点,但似乎却给人一种“新瓶装旧酒”之嫌,好像是仅仅是把三大理论借助 SRG 这一概念重新表述了一番。

其次,本书在变量的操作上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之处。SRG 是整个 NIP 理论的核心,毛兹通过地理邻近性、先前的冲突经历和战略对手作为 SRG 的策略指标。正如它对 NIP 理论的建构效度检验结果所表明的一样,这一操作概念虽然总体上与其概念定义相符,但却存在遗漏信息部分,这主要是由于操作定义产生的。例如,先前的冲突经历和战略对手反映了 SRG 的功能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中,不存在永恒的敌人。在一个长时段来看,过去的敌人也有可能变成今天的盟友。毛兹的这种测量并不能很好地反应出 SRG 的演变。因此,

①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 23.

② 这个概念由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提出,指对于同一主题使用不同的数据、方法、设计进行研究常常得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结果,参见 Alex Mintz and Bruce Russett eds., *New Dir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ronting the Methods-of-Analysis Problem*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4)。

③ 该软件可以在毛兹主页上免费下载,参考 <http://psfaculty.ucdavis.edu/zmaoz/networks/netsoftware.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11年3月17日)。



对敌人或冲突经历的测量应该被限制在一个时间区间内，例如，国际关系中常见的是以五年作为一个观察区间。

第三，本书在对一些数据解读上存在不足。例如，在统计结果与 NIP 理论预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作者几乎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在社会科学中，这种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不一致往往成为发现新问题、建立新理论的重要突破点。因此，本书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确实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对确实数据的处理。本书采用了大量的历史案例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 1816-2001 年近 200 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个时间段中，存在许多缺失数据严重限制了本书的分析效力。例如，贸易数据只追随到 1870 年，这严重影响了本书关于网络演变的研究。如何通过其他的渠道，收集更为完整的数据，不仅有助于补充本书解释不足之处，也有利于整个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不足是本书使用的网络数据分析仍然缺乏一个动态模型，^① 这些数据由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单个网络中收集而成，仅仅是在特定的时间点记录了关系网络中的一些“掠影”，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不同网络相互之间的互动发展，因此也就不能完整地追踪这些关系特征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

从本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分析工具，它对概念的测量和操作需要严密的计算，对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陌生的读者来说，准确理解本书的理论观点仍具有一定的挑战，这也是本书为什么要用第二章来介绍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关工具。这种复杂的技术阻碍了社会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广泛使用。事实上，这种情况正如作者在本书序言所述，“要让期刊的审稿人或研究项目的管理者相信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对这个领域贡献新的知识真是一件艰难的事……在每一篇文章中，我们都要花大量的篇幅解释社会网络是什么，如何界定网络等等。”^② 因此下一步研究的重点便是如何将社会网络分析与国际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发展适合于分析国际关系的网络概念，让更多的人相信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对国际关系研究贡献新的知识和理解。

[责任编辑：邓子立]

^① 陈冲、刘丰：《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第 110 页。

^②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Preface, xi.



精神世界的回归？

——评《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

邓子立*

内容提要 理查德·勒博所著的《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是国际关系学界鲜有的突破性学术成果之一。勒博重新设计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试图提出一套宏理论去重新阐释国际关系史。作者认为欲望主导着现阶段对国际关系史的思考，而希望强调精神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关键作用。笔者认为勒博最大的贡献在于肯定了精神在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作用，而这一点似乎被强调恐惧或欲望的主流国际关系学派所忽视了；然而书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比如基于个体层面的实践理性是否能够在国际关系领域付诸实践，以及在规范的界定与作用上缺乏更加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 勒博 精神 欲望 国际关系 文化理论

理查德·勒博（Richard N. Lebow）所著的《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①是国际关系学界鲜有的突破性学术成果之一。^②勒博重新设计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试图提出一套大理论去重新阐释国际关系史。勒博说明自己研究计划与进程时指出：“在《政治的悲观看法》^③一书中我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本体论，而《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则试图在新本体论上建立一个内嵌于政治秩序初步理论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接下来的研究成果中，我希望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关于政治秩序的成熟理论。”^④无论对书中观点是否完全赞同，读者不得不佩服作者所用到的详实、充分、庞杂的历史材料，以及跨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勒博最大的贡献在于肯定了精神在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作用，而这一点似乎被强调恐惧或欲望的主流国际关系学派所忽视了；然而书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比如基于个体层面的实践理性是否能够在国际关系领域付诸实践，以及在规范的界定与作用上缺乏更加深入的探讨。

一、国际关系的文化解读

（一）书中理论概述

从古希腊时期伟大哲学家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人的身上得到启发，勒博指出人类至少有两种动机（motive），一种是出于对物质上需求的满足，即欲望

* 作者简介：邓子立，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① Richard N.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David A. Welch, “A Cultural Theory meets cultures of theory,”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2, 2010, pp. 446-453.

③ Richard N.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knowledgements, p. ix.



(appetite); 另一种是出于对自我尊重的满足, 即精神 (spirit)。^① 因此, 在理想状况下存在两种极端情况, 即精神世界和欲望世界。精神世界以精神为动力, 以实现自我尊重为目标, 通过获取荣誉和地位来实现; 欲望世界以欲望为动力, 以利益为导向产生合作或冲突, 以获取财富和安全为目标。然而历史和现实从来不会是单一模式所主导的, 都是上述两种类型社会不同程度混合的产物, 现实世界总是在这两种基本动力的组合下演进的。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特定事件中, 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起主导作用的主动力和主导模式, 而且任何社会秩序不是静态的, 在某种情况下自身会孕育转变。

在此基础上, 勒博提出人类的第三和第四种动机, 即理性 (reason) 和恐惧 (fear)。勒博从驱动力角度来重新定义理性, 认为“理性”是对规范之所以是合适和有益的合乎逻辑的理解, 能够约束 (constraint) 和教导 (educate) 上述两种基本动机——欲望和精神, 目标是实现人类幸福与满足。^② 在理性世界中, 由于人们普遍理解实现人类幸福与满足的目标, 享有共同的正义和价值原则 (即实现人类的幸福和满足), 因此合作成为一种规范, 即使产生冲突也轻易化解。因此, 理性世界是有序的。然而, 如果理性不能有效实现约束和教导, 也就是说出现不受约束的欲望或不受约束的精神, 恐惧由此产生。在恐惧世界中, 人们首先关注自身安全, 由于担心其它成员会剥夺其利益, 每个人都试图使自己变得足够强大以威慑和打败所有可能的对手, 社会成员追求的目标及其手段都不受规范约束, 冲突不可避免而且愈演愈烈。因此, 恐惧世界是无序的。

笔者用平面坐标划分来表示人类动机与社会规范、秩序之间的关系 (如下图)。横轴表示人类动机, 最右端是精神, 最左端是欲望; 纵轴表示社会规范的遵守程度以及社会秩序的有效性, 最上端是理性世界, 最下端是恐惧世界。欲望或精神可以解释国际政治中合作或冲突产生的原因和性质, 但欲望和精神本身并不决定合作或冲突的频率与烈度, 也就是说社会成员的心理动机与社会秩序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关键在于社会成员的欲望和精神是否受到理性的约束或教导, 也就是说是否形成和接受关于行为体权利与义务的社会规范。勒博认为, 对精神和欲望的区分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对国际关系加以理论化, 勒博理论的核心是关注合作、冲突和风险偏好的不同逻辑, 并把这些与理性、精神、欲望和恐惧为基础的世界联系起来。

勒博认为, 欲望主导着现阶段对国际关系史的思考。现实主义过于强调理性 (工具理性) 的作用而错误地把世界看作由恐惧为基本动力的永恒竞争, 即单一国家的理性行为将导致国际秩序陷入“安全困境”的无政府状态之中; 自由主义过于强调欲望的作用而错误地把世界看作主要由利益所驱动。勒博希望阐述精神在国际关系史中扮演的关键作用, 因为精神的作

^①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3~96.

^② 勒博认为理性存在于多个层次上, 并划分为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 下文将展开论述。See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12~515. 理性主义流派一般认为, 理性是“行为体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See Duncan Snidal,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ted Kingdo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p.74; Jon Elster, *Rational Cho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Miles Kahler,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919-941.

用一直以来被忽略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欲望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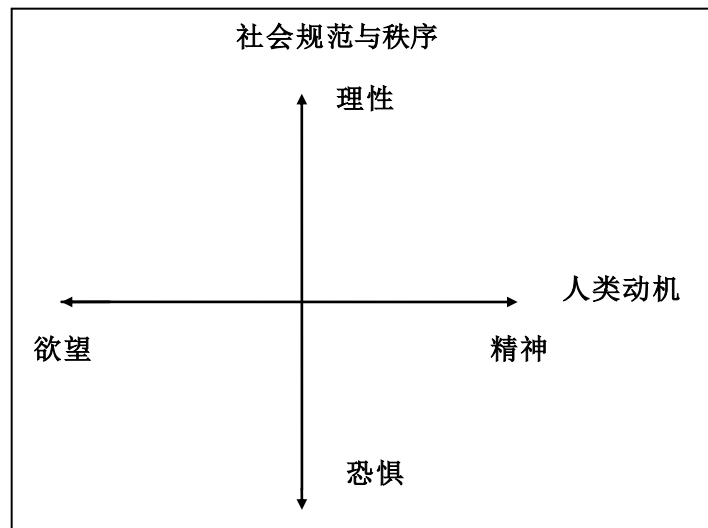


图 1：人类动机与社会规范、秩序

（二）精神世界与自我尊重、荣誉、地位

根据勒博观点，“精神”是一种人类固有的驱动力，以自我尊重（self-esteem）为目标，以获取荣誉（honor）和地位（standing）为手段。^① 在精神世界中，寻求自我尊重成为个体或政治集团最重要的目标，具体表现为接受并出色完成社会等级所赋予的角色与任务；安全或利益只是次要目标。尊重是指别人如何看待我们，而自我尊重是指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简单来说，自我尊重是指个体或集体对自身有良好的认知，对自身价值的肯定，面对挑战时对自身能力抱有信心。自我尊重是关于个人荣誉和地位的一种主观感受，一般通过他人表示的尊重得以反映。

地位与荣誉是实现自我尊重的手段，它们也是一对密切相关、相对意义上的概念。荣誉来自其它成员对行为体突出表现的外部认可，而地位是指行为体在等级中所处的位置。荣誉和地位必须与等级联系起来理解，而等级被定义为地位的排名秩序。在精神世界中，荣誉决定了身份本质以及谁具有什么身份，行为体的等级地位是根据所获荣誉的多少来衡量的。每一种身份均拥有特权和一套规则，地位越高所拥有的荣誉和特权就越大，同时也需要承担更多义务和遵守相应规则。在传统精神世界中，荣誉源于勇士在斗争中的英勇善战；而在近代社会中，荣誉更多地表现为在等级社会中坚持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在国际关系中，荣誉也是一种制约大国行为的机制，有助于防止出现在利益主导的世界中常见的野蛮剥夺现象。由于某些行为体对荣誉与地位不相符而对等级秩序发起挑战，这种情况如果不尊重其他行为体的权利会引起不满，这种不满会让挑战者成为众矢之的，破坏社会规范引发的惩罚机制使紧张局势得以缓和，因此“荣誉—地位匹配”机制能够维持等级秩序的稳定。

^①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61~164.



荣誉和地位也可能出现分离。因为地位是一个关系概念，荣誉世界是竞争非常激烈的。在精神世界中，荣誉被赋予的价值以及争夺荣誉的竞争程度，诱使行为体不择手段地获取荣誉。一旦行为体破坏规则并逃脱惩罚，那么其它行为体同样不会遵守规则以免吃亏。如果荣誉规则不断受到侵犯，荣誉将变成毫无意义的概念。对荣誉的争夺将转变为对地位的争夺，这会使得行为体的行为越发不受约束，甚至更加暴力。我们可以预见，在国际关系领域之中将是一个“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的恶性循环模式。

勒博提出，国际体系已经开始发生转变。正如勒博在书中最后所说，“国际体系也许会隔代遗传，国际社会仍然存在许多勇士社会的价值观……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等级制仍然存在，由不同国家引起的挑战仍在进行之中，他们要求基于荣誉的地位，国际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像国内社会，在于国际等级社会慢慢形成，并开始为争取荣誉和地位而挑战权威”。^①

二、精神世界的回归：以日本大君外交体制为例

笔者认为，勒博最大的贡献在于为国际关系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从古希腊时期的传统等级社会提炼出精神、荣誉等核心概念，并试图将其理论化尝试解释两千多年的国际关系史。从精神的角度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的确获益良多。笔者借用勒博的理论，试图对日本幕府时期的大君外交体制进行解释。如果说是欲望主导日本国家行为的话，显然幕府时期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会带来更多经济利益，但为什么勘合贸易只是昙花一现？这个问题都是强调恐惧的现实主义历史观或强调利益的自由主义历史观无法明确解释的，而借用勒博提出的精神或荣誉的概念及相关理论，则可以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从源赖朝开始直到明治维新（准确来说到甲午战争前后）时期的日本是一个等级社会，武士阶级一直掌握着实际领导权。武士阶级在日本政治与社会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在日本国内社会，武士阶级的统治表现为维系了公武二元并存的局面，巩固了具有权力多元分化特征的幕藩体制，确定了按士农工商顺序排列的社会秩序并使上述诸阶级间处于一种相互排斥，又多元并存、相互依赖的状态；在日本对外关系上，武士阶级的统治则表现为武士阶级把荣誉和地位置于经济利益之上，恢复与明帝国邦交未果后，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日本与明朝交往可以追溯至室町时代的勘合贸易。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足利义满以日本国王的名义称臣入贡，接受明朝《大统历》，奉明为正朔。此前，他还欣然接受明惠帝对其“日本国王源道义”的称呼，并在1403年致书明成祖，以国臣自称。^② 中国学者指出：“日本在明初，曾一度恐怕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主动、明确地加盟‘华夷秩序’”。^③ 足利义满向明朝称臣只是一种名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其实，足利义满称臣入贡也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灵活性，也即利用朝贡名义，与中国进行不等价贸易，从中博取巨

^①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570.

^② 米庆余：《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③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8年第6期。



利。中国学者认为，足利义满“尽管在国书中称臣，但并没有赋予明帝以任何政治权力或承担何种政治义务，相反，却在经济领域中获得巨大的实惠。”^①

然而，尽管深知勘合贸易能够带来经济实惠，但德川时期始终坚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最终导致未能与明朝恢复邦交。统一日本之后，德川家康首先与朝鲜，接着与琉球分别恢复了邦交，以此谋求与明朝接触。然而，通过朝鲜或琉球来实现对明复交的意图均告失败后，幕府只好直接与明交涉。1610年，幕府对渡航来日的广州商船发给许可在沿岸自由贸易的“朱印状”，以示好意。同年年底，以德川家康的执政本多正纯^②的名义，委托来日的南京商船致书福建总督。^③书信中说到：

“方今吾日本国主源家康^④一统阖国，抚育诸岛，左右文武，经纬纲常……其教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他如安南、交趾、占城（以上即越南），暹罗（即泰国），吕宋（即菲律宾），西洋（即新加坡以西各国），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无不上书输贡。由是益慕中华而求和平之意，无忘于怀……明岁福建商舶来我邦，期以长崎港为凑泊之处，随彼商主之意，交易有无，开大共市岂非两国之利沪。所期在是耳。比（彼）其来也，亦承大明天子之旨，以赐勘合之符，则我邦必遣使船，以来秋之番风，而西其帆者何疑哉……我邦虽日出海隅，谚亦所谓蕞尔之国（小国）也，中华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废乎。然则来穗所请，盼符使来，则海东之幸，而黎庶之所仰望也。”^⑤

本多正纯的书信实际是幕府大学者林罗山^⑥草拟的，书信中阐述了日本在渴望与明朝开展贸易获取经济利益，同时也显示了日本一直所追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然而，在当时这两者是相互矛盾且不可兼得的。书信后段要求恢复勘合贸易，从明朝角度来看，勘合贸易就是朝贡，准许朝贡就是要以明朝皇帝对大君（将军）加以册封为前提，这就意味着日本必须加入中华帝国的华夷秩序，成为宗藩关系。但是，书信前段却宣称各国向日本朝贡，在华夷秩序以外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换言之，这等于向华夷秩序宣布挑战。在朝贡与荣誉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日本最终选择了后者，即试图构建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君外交体制。

① 张声振：《中日关系史》（第1卷），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

② 本多正纯（1565年—1637年），战国末期到江户时代的武将，下野小山藩主、下野宇都宫藩主（第28代宇都宫城主），德川幕府初期的老中。父亲为德川家康的宠臣本多正信。

③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23页。

④ 源家康即德川家康，因德川家族为源氏之一支。

⑤ 纸屋敦之：《大君外交与东亚》，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第14页，转引自米庆余：《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⑥ 林罗山，本名信胜，字子信，号罗山，通称又三郎，出家后法号道春。出生于天正11年（1583年）卒于明历3年阴历1月23日（1657年3月7日）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家、林家学派创始人。



三、基于个体层面的“实践理性”在国际关系领域难以实现

勒博从古希腊先哲思想得到启示，指出理性可以划分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和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工具理性是指行为体追求欲望和精神的满足，以实现自我需要的最大化；而实践理性能够通过约束和教导行为体的欲望和精神，使行为体不断调整其行为和目标，以实现人类幸福和满足。

勒博认为工具理性是导致社会秩序走向崩溃的根源，转而认为只有实践理性才会有益于人类福祉。在工具理性的驱动之下，行为体追求实现欲望或精神需求的最大化，事实往往是国家对国家利益或国家地位的追求是难以满足的，进而使国家所要达到的目标及实施的手段越来越不受规范约束，逐渐失去了对欲望或精神的控制，那么恐惧世界就会到来，之前相对均衡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破。由此，勒博提出“实践理性”的概念试图为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寻求一种解决方案。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最大差别在于，实践理性驱动下的行为体从个体或人类出发，认为实现人类的幸福和满足是最终目标。因此，实践理性下的行为体享有共同的正义和价值原则，合作成为一种规范，即使存在冲突也轻易化解，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实践理性不仅描述了人们选择和从事现实行为中的缜密思考以及对自我行为的控制，而且还将人们对自我行为的选择与对未来的期待是联系在一起的。实践与理性能够统一于人的主体性之上。^①

然而，笔者提出的问题是，从个体层面提出“实践理性”在国际关系领域如何界定和实施？首先，实践理性指向的目标不明确。实践理性提出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幸福和满足，但是虽然勒博从古希腊伟人的思想中找到很多依据，但始终没有解释到底什么才是“人类幸福和满足”，也没有提出一些具体指标。实际上，笔者认为不可能清晰界定所谓的“人类幸福和满足”，这个概念不仅关系到和平与战争议题，还关系到发展议题，同时还存在文化与价值判断的差异，试图涵盖一切的口号是缺乏说服力的。由此，既然实践理性要达到的目标无法明确，那么又怎么确保实践理性比以“实现欲望或精神需求最大化”为目标的工具理性更有说服力呢？

其次，实践理性的主体不具备足够的力量。实践理性的社会行为体主要是个体或政治集团，特别是国家的决策精英。换言之，实践理性必须被一国的决策精英所学习和接受，并反映在国家的对外决策上，用勒博的话来说，就是约束和教导欲望或精神，不断调整国家目标和对外行为。然而，笔者认为对于决策精英而言，实践理性要求未免过高，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学习和接受如此微妙的人类动机。历史上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国家欲望，然而俾斯麦下台后，威廉二世却没有掌握如此高超的本领，使德国的国家目标及手段越来越不受规范的约束，从而走向了恐惧世界。由此可见，实践理性单靠个体实施，显然是不可靠的，因为即使是国家决策精英也往往不具备足够的能

^① 葛洪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力，然而勒博没有为实践理性的实施指明可靠的制度保障。笔者认为，实践理性可能产生于成熟的民主制国家之中，因为制度总比人可靠。

最后，基于个体的“实践理性”难以统合到国家层面。勒博强调“实践理性”旨在实现人类的幸福和满足，但是他没有很好处理人与国家的关系，这个矛盾也反映为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在人的概念理解上的分歧。属于世界主义阵营的勒博显然无法解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由于对人的概念的不同理解所引起的分歧。世界主义高度重视个体或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价值，而对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民族国家——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而社群主义则更加钟情于政治性社群而非个体，认为个体是通过社群构成的，其意义与自我实现极大地依赖于所处的国家。^① 有的学者干脆将社群主义称为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② 如果分别按照人的两重属性观（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在人的概念理解上的分歧如下表所示。可见，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对人的概念的不同理解源于他们对不同价值主体的坚持。^③

表 1：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在人的概念理解上的分歧

	世界主义		社群主义
价值主体	人		国家
	个体	人类	
人的属性	自然性	社会性	

资料来源：李开盛、颜琳：《人的概念与国际关系规范理论的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3期，第22页。

四、规范的界定和作用值得商榷

勒博对于社会规范的看法是悲观的。早在《政治的悲观看法》一书中，作者从规范的复杂性与动力出发，认为行为体存在不同的价值观时，对规范的妥协和包容是暂时和脆弱的，因此国际社会体系本身就是不稳定的，规范被削弱和打破的过程也是社会体系走向崩溃的过程。^④ 勒博假设规范是给定的，而行为体要么遵守规范，要么破坏规范，规范被削弱和打破也就意味着实践理性的丧失，恐惧由此产生。然而，笔者认为，勒博对规范的含义与作用的理解有所偏差，首先，对规范界定的出发点应该是规范本身而不是行为体的行动；其次，勒

①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79.

② Heikki Patomaki, *From Normative Utopias to Political Dialectics: Beyond a Deconstruction of the Brown Millennium*, Vol. 21, No. 1, 1992, pp. 53.

③ 李开盛、颜琳：《人的概念与国际关系规范理论的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3期，第22页。

④ See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博只强调了规范的限制作用而忽略了其建构作用，从而忽视了行为体对规范的内化过程。

首先谈谈对规范的界定。对规范界定的出发点应该是规范本身，而不是行为体对于规范的态度或者行为体按照规范采取的行动或具有的期望。从这个角度来看，规范不应该是行为体的一种预期，而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行为体或出于功利的目的，或出于一定的认知方式和认知基础，做出符合规范的行为或对这种行为产生一定的期望。按照一定的准则行动或对一定的行为进行预期，这是描述人的行为，而不是描述规范本身。只有行为体所遵循的准则本身，才可能是规范。正如马莎·芬尼莫（Martha Finnemore）所说的：

对于规范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即具有给定身份的行为体适当行为的准则……政治学中的建构主义称之为规范的概念与社会学称之为制度的概念实际上是同样的行为准则……根据社会学理论，“规范”和“制度”的一个不同之处是聚合性问题：规范指的是单独的行为准则，而制度强调的是诸多行为准则的组合与汇聚（即“一组实践活动和准则”）。^①

接下来谈谈规范的限制作用（regulatory effect）和建构作用（constitute effect）。笔者认为，勒博对规范的作用理解值得商榷，只强调了规范的限制关系而忽略了建构关系，因而忽视了行为体对规范的内化过程。规范可以产生因果联系，具有因果作用，这是理性主义颇为关注的话题，因果关系回答的是“为什么”的问题。^②建构主义认为，规范还可以产生限制关系和建构关系，具有限制作用和建构作用，从而把规范划分为限制性规范和建构性规范。所谓限制关系，是指一种事物受其它事物的限制而存在。^③建构关系是指一种事物在逻辑上依赖于其它事物而存在，它回答的是“怎样才成为可能”或“是什么”的问题。^④

笔者认为勒博主要强调规范的限制作用，并没有讨论限制性规范在限制作用的基础上能产生建构作用。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认为，限制性规范涉及确定行为标准，进而塑造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协调他们的行为，也就是说，限制性规范首先具有限制作用，

^①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eter J. Katzenstein,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undation, 1999, p. 251.

^② 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参加制度的功利假设，即行为体通过“成本—收益”计算，如果能够得到相应的好处，就会加入某一制度（一套规范），就是一个规范可以具有因果作用的典型案例。加入制度会带来好处，回答了为什么加入的制度的问题。

^③ 关于限制作用的理解，我们可以用尚未被内化的“红灯停”这一交通规则，进一步具体分析其与因果关系的不同。“红灯停”的交通规则限制了行人的一定行为选择。我们问“在红灯亮起的时候行人停住不走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我们的回答是，“x（红灯停）在c（交通规则）的限制下才可能产生y（行人停下）的局面。”x既不发生在y之前，也不独立于y而存在，因而x不是y的原因。y（行人停下）的局面是由特定的交通规则x（红灯停）所限定的，y不能独立于其特定的限制条件x而存在。参考高尚涛：《规范的含义与作用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144~157页。

^④ 根据温特观点，一种是通过其内在结构建构的，例如水是由H₂O的原子结构建构而成的；另一种是由“类别置身于其中的外在建构”建构的，例如“奴隶主是由与奴隶的关系建构的”，这些类别的属性不能独立于其内在的或外在的结构条件而存在，因而不属于因果关系的范畴。参考[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108页。



在此基础上可以发挥建构作用，限制性规范的作用方式和机制是“由限制而构成”。^①而构成性规范表明了行为体的认同，也规定行为体利益和约束行为，这意味着，构成性规范首先主要具有建构作用，并从而具有限制作用。^②这说明构成性规范在建构事物的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行为选择。所以，构成性规范的作用方式和机制是“由构成而限制”，与限制性规范的作用机制正好相反。

五、一些思考

《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篇幅甚大，旁征博引，内容丰富，富有启发，然而笔者难以用准确、精炼的语言来表达书中观点，更难以从精神角度深入探讨跨越两千多年的国际关系史。笔者认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首先在于该书为我们理解国际合作与冲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其次在于该书大开大合，以大理论来分析历史，其写作技巧、论证方法以及跨学科研究等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最后在于该书为从文化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提出了新问题以及有前景意义的研究议程。

就勒博思想本身而言，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有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首先，从人类动机两分法（欲望和精神）来探讨国际合作与冲突是否存在问题，因为人类动机难以检验，事实上往往是兼而有之的混合物，能否用两分法来涵盖人类所有现象是值得商榷的。其次，书中肯定了精神或荣誉的作用，甚至认为精神主导的世界比欲望主导的世界更有益于人类福祉，然而书中并没有充分论证，这也成为书中薄弱之处。第三，作者从个体层面提出理性与规范，试图用不变的概念去解释社会的变动，这需要处理两个问题，第一是个体层面的理性与规范如何上升到国家层面，国家是否独立于社会；第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性与规范应该如何界定，又是如何产生作用，这些书中都缺乏清晰说明。最后，勒博提出的大理论自以为是独立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学派，然而笔者认为，一种理论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反驳与修正的过程，从而具有丰硕而深远的成果，正如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一样。

就国际关系学科而言，勒博的文化理论对国际关系历史与现象作出了新的解释，强调精神的作用，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拓展大有裨益。首先，从科学理论角度而言，勒博的文化理

① 例如交通规则“红灯停”，这一限制性规范首先表现为限制行为体的一定行为选择，即红灯亮起，行人停下，具有限制作用。在这种限制作用的基础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限制作用的持续，“红灯停”的交通规则会慢慢内化，行为体会感觉到遵守这一交通规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这一规范就转变为行为体的一种“合理性逻辑”，并以此塑造出行为体对这一规范的认同，即行为体认为遵守这一交通规则是符合自己身份的合适的行为，限制性规范于是转化为构成性规范。参考高尚涛：《规范的含义与作用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144~157页。

② 关于建构性规范的理解可以举弈棋规则的例子。象棋这项游戏是由特定的构成性规范“弈棋规则”建构起来的，这些构成性规范不仅建构了象棋这样一种游戏本身，同时也建构了弈棋双方的身份（按照特定的弈棋规则进行游戏的两个人，被称作弈棋者和弈棋双方）。“弈棋规则”这一构成性规范在起到上述构成作用的同时，还限制了弈棋者的行为选择：只有按照象棋的特定弈棋规则进行游戏，才是下象棋；要想下象棋，就必须按照其“弈棋规则”走棋。参考高尚涛：《规范的含义与作用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144~157页。



论旨在创造一套有助于理解人类本性的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与主导范式强调“经济人假设”不同，勒博通过人类心理动机建构新的理论，基于这一点，勒博称其理论为“文化理论”。其次，从科学哲学角度而言，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争论中我们得出：实证主义不再是社会科学的主导者，取而代之是所谓的“科学现实主义”（scientific realism），“科学理论”不仅是指经由可观察事实检验的解释型理论（explanatory theory），同时也包括以未知或不可观察的事实为内容的建构型理论（constitutive theory），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国际关系学科，在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上已进入多元化时期，而勒博的文化理论则是反思主义建构型理论的代表。勒博从人类心理角度提出的文化建构理论，补充了以往实证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真空与不足，也为国际关系研究开拓了新天地。最后，从理论的现实意义而言，对于强调精神作用的文化理论对于国际关系实践的具体现实意义，作者没有做出具体回答，笔者根据文章思路大胆猜测，以古代东亚华夷体系为参照，未来的国际关系将出现相似的情境，等级划分的国际社会各国将以荣誉的多少确定国际地位，国家对外政策将以实现自我尊重为目标，然而理论的现实意义还有待进一步实际观察。

[责任编辑：刘明]

2011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邀请函

尊敬的专家、学者及学界同仁：

您好！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 2011 年会议将于 7 月 8-10 日在北京举行，会期两天。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组委会诚挚邀请国内外同行拨冗参加会议。

在各位学界同仁的热心参与下，去年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讨论小组达到 60 个，与会人数也超过以往。本次会议希望一如既往地得到您的支持，秘书处将为各位与会者提供最周到的会议服务。

一、时间安排

1、欲组织学术专题、圆桌交流、培训班和论文会诊者，请在 2011 年 5 月 31 日之前向会议秘书处提出组织学术专题、圆桌交流、培训班、论文诊所的申请。如筹组学术专题和圆桌交流，请同时提交三位小组讨论人和一位主持人姓名。如筹组培训班，则请提交讲授者姓名。如筹组学术专题，需在 6 月 10 日之前向会议秘书处提交会议论文。其他与会者，请在 7 月 1 日之前向会议秘书处报名。

2、会议注册时间从 7 月 8 日 14 点开始。此次会期为 7 月 9 日和 10 日，共两天。预计 7 月 8 日 18 点和 9 日 18 点由会议主办方举行招待会，7 月 10 日 18 点会议结束。

二、费用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将为每个讨论小组的组织者提供 500 元的资助，资助费用将于会议注册日领取。会议期间，会议秘书处负责提供会议室和相关后勤服务。与会者往返交通费和住宿费自理。

三、会议地点

北京西郊宾馆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8 号西郊宾馆会议中心。联系电话：010-62322288 转 5669 或 5668

四、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秘书处联系方式

传真：010-62773173 电话：010-62788801 联系人：王小云

约瑟夫·S·奈



约瑟夫·S·奈 (Joseph S. Nye),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 曾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 现任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奈因提出了“相互依赖”、“软实力”、“巧实力”等重要概念而为人们所熟知, 是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学术之路: 奈生于 1937 年, 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学士学位, 随后拿到罗兹奖学金, 在牛津大学度过了他的研究生生涯, 并最终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奈于 1964 年进入哈佛大学教职工队伍, 现任肯尼迪政府学院名誉院长、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美国外交协会研究员, 同时也是贝尔福

中心董事会董事和多边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奈曾任哈佛大学的国际事务中心主管、狄龙国际事务教授和艺术与科学学院副院长。他还担任过阿斯彭战略集团、东西方安全研究所和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主任, 同时还曾是国际经济研究所咨询委员会的一员。除了在哈佛的工作, 奈在日内瓦、渥太华和伦敦也曾有过短暂的教学生涯。

从政之路: 奈不仅在学术方面颇有建树, 他的从政之路也可圈可点。奈曾经担任卡特政府主管安全援助和科技的副国务卿帮办(1977-1979), 主持负责核不扩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1993-1994)和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1994-1995), 还曾经是联合国裁军事务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值得一提的是, 奈在美国两届政府的三次任职均获得美国政府颁布的“杰出服务奖”, 这是对他的工作能力的高度肯定。在 2009 年 1 月奥巴马上任组建政府之初, 他曾是美国驻日大使的考虑人选之一。

研究领域: 奈在对亚太和欧洲的地区研究、共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制度、美国对外政策、软实力、情报安全、恐怖主义、核武器控制和国际伦理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主要著作: 奈著作颇丰, 在 1985-2011 年就发表著作、论文、书评、评论等一百六十余篇(部)。他较近的著作有《权力的未来》(2011), 《灵巧领导力》(2008), 《软实力: 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2004), 《理解国际冲突(第五版)》(2004), 《权力游戏: 一部华盛顿书写小说》(2004), 《美国霸权的困惑》(2004), 《治理方式: 信息时代的民主》(2002)、《注定领导世界: 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1990)、《权力与相互依赖》(与基欧汉合著, 1977年初版, 2001年第三版)等。



第一关键词：软实力

约瑟夫·奈因他提出的“软实力”概念而誉满全球，这一概念甚至比他本人更为大众所熟知。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问题的看法，使人们在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的同时，也思考着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等无形的“软实力”。他认为权力可以用三种手段达到：一种是大棒（威胁），一种是胡萝卜（利诱），而第三种则是吸引，即“软实力”。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他将国家的软力量归于三种主要资源：其一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的文化；其二是能真正实践的政治价值观；其三是能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

2011年2月，奈在CNN（美国有线电视网）发表评论《在信息时代，软实力将会获胜》，借当时刚刚在埃及发生的事件，介绍了其在软实力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该评论中，奈认为发生在埃及的“事件”是一场意义重大的“革命”：在18天的时间里，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非暴力社会运动推翻了一个强力专制政府，甚至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运动。

奈赞同美国对这种非暴力革命秉持的欢迎态度，但奈认为埃及若要走上真正的民主之路，还需要修改宪法，然后确立起公正自由的选举方式。目前维持埃及秩序的埃及军方虽然不大可能武力镇压反对派，但他们能否确保埃及的民主化不变质，仍然是个疑问。

出乎很多观察家意料，穆巴拉克去职后埃及的领导权并未落入穆斯林联盟手中，而且穆斯林联盟的支持率只有15%。奈认为，这表明随着信息的传播，在埃及（当然也包括其他地区）社会中占主流的思想立场越来越去极端化。与此相伴的社会思潮的日趋多元化，彰显了奈倡导的“软实力”的重要性。

奈认为，信息革命导致了在当今世界中，一国需要同时考虑应对别国政府及其国内社会，此外，还需要同时考虑军事援助等硬实力建设和叙事手法与价值观之类的软实力工具。发生在埃及的事件遑论结果如何，都说明了信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

这种变局使得国家越来越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不管国家怎样努力控制，仍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事务脱离其控制。在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社会里，权力的分散对霸权国的威胁比权力的过渡转移更大。

传统观点认为，军事强国能够取得优势；但是在信息社会，通常是能够讲出更赢得人心的故事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有可能占据上风。因此，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越来越重要。当然，当今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被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所严重影响的时代（古腾堡的印刷机就曾经促进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但奈指出，这恰恰就是信息革命的特殊之处，不在于信息的传播超越了多少条国界，而在于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和参与者的广泛性——从美国的角度，



奈精彩地诠释了“权力”的最新内涵，并建议施政者将硬实力和软实力融入更加巧妙的策略（smart strategy）之中。

第二关键词：中美关系与美国霸权

约瑟夫·奈对于“美国衰退论”，有着自己的见解。尽管眼下许多中国人津津乐道于“美国衰落了”，也有不少美国人忧心忡忡于“中国崛起了”，但奈认为二者都有失偏颇。奈指出，尽管中国近年来取得的经济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加之中国仍然面临着国内的经济不平衡、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等问题，所以中国是否具备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寻求超级大国的地位仍令人怀疑。所以在奈看来，中国将很难像上世纪初德意志帝国对英国构成的挑战那样，对美国构成同样的挑战。

奈认为，尽管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比美国好，但这仅仅是短期现象，也并非美国衰落的标志。美国时常会有“衰落论”，比如上世纪 5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都曾有不少美国人担心美国不行了。然而这些更多的是反映一种心理忧患意识，而非真正的实力衰落的现实。只不过这种心理因素的危险性在于，它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中国的误判，并进而危害原本正确有效的外交政策。

在 2011 年初，奈为《华尔街日报》撰文《关于美国衰退的误导性隐喻》，认为美国的霸权在 21 世纪仍有可能维持，现在唱衰美国为时尚早。

奈在文章开端就提出，与有机体不同，国家没有生命周期，因此，美国的衰落不是必然来临的。奈同时指出美国一时的挫折不代表美国的衰落，美国即使衰落也不必然意味着美利坚的全球霸权很快就会终结。况且，目前对中国实力的衡量存在偏颇。

奈引用历史，说明中国不是美国霸权眼中的第一个挑战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苏联和 80 年代的日本都曾享此殊荣。然而，当时的美国夸大了两国的威胁——苏日相继衰落，美国却“风景这边独好”。中国是否是下一个苏联或日本，谁也不能确定。

奈进一步指出，在对目前中国实力的评估上人们存在很大的偏见，大多数评估都低估了中国未来政治发生变局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中国在未来未遭遇重大的国内挫折，评估中国的力量也不能仅仅依靠 GDP 数字——中美的实力衡量与对比，还需要考虑到美国在军事力量和软实力方面的优势，以及中国的地缘劣势等情况。

奈对中美关系最乐观的预期是，中国将资本交由美国管理，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在 21 世纪中期前仍无法超越美国。而对于美国的前景，奈认为，尽管会遇到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美国仍然可能是 21 世纪诸国中最强大的。奈引用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的观点，认为美国霸权与以往霸权的两点不同可以解释他对美国的预测：美国霸权的建立依靠结盟而非建立殖民地，因此霸权的实现进程非常灵活，即使一时过度扩展也能很快恢复常态；美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创新性，使得美国能够在信息时代取得主动。美国目前



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在现有体制内得到解决；美国最需要警惕的，是自身因对恐怖袭击反应过度而出现的自我封闭。

后记

约瑟夫·奈教授作为一位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而且在美国政界也能有一番作为，这种情况在美国并不鲜见。奈的成就说明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实践互动结合的必要性。奈教授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独立发声而不为舆论和环境所左右，其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其见解也足以令人思考。

[责任编辑：任娟]

国际关系论坛“纵横国关”国际问题沙龙会议邀请函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队伍正在逐渐的扩大。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学习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相关专业的博士、硕士、本科学生已经逐渐形成气候。与此同时，青年教师和年轻学生对于共同交流，促进成长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为了推动北京地区的国际关系学术交流，促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更快更好发展，国际关系论坛联合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研讨会，在2010年已经成功举办两期学术沙龙。在2011年度为了让学术活动更加普及化，现将2011年上半年的学术沙龙题目公告，每月一期，举办时间为当日晚上6:40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术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欢迎各位老师同学报名参加。

具体时间安排：

期数	时间	主题
第三期	3月30日	2011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与中美关系
第四期	4月13日	伊拉克战争八周年反思与新时期美国全球战略
第五期	5月18日	东北亚局势与中朝关系
第六期	6月8日	互联网传播与国际关系

随信附上学术沙龙乘车路线，北京地区同学可以乘坐375路、特5路、特10路、384路公交车坡上村站下车，或者乘坐地铁4号线，北宫门站下车，下车后选择国际关系学院出口出来即可。欢迎感兴趣的老师和同学参与会议，期待着您的真知灼见。报名会议，或者参加主题发言请具体联系指定联系人：范汪洋

45240503595；徐赛：15210503600 邮箱：uirsalon@126.com。

国际关系论坛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研讨会
2011年3月9日



【编者按】为了更好地增进国际关系系内外师生的交流，引导大家在提高专业素养的同时保持对国内外时政的关注与思考，本刊从本期开始增设“笔谈”栏目。本栏目不求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但求独立自主的个性思考，以短小精悍的评说一展南开学子对家国天下的关怀。

两会与中国足球

温信赢*

父亲是中国队球迷，因此被中国足球调戏多年。目睹国足直奔角球杆的射门后，父亲长叹：“太离谱的球就别射啊！”要真如此，中国队全场便无射门，必输无疑。

中国足球此种毛病似乎传染到了政界。每年的两会，都会有些代表提出些不着边际的提案，就像直奔角旗杆的皮球。这样的提案被戏称为“雷人提案”。忧心时政的朋友免不了义愤填膺，更多的朋友则把这些提案当成笑话书，就像把国足比赛当成喜剧电影一样。当然也有跟父亲一样想法的人，例如《瞭望》杂志在《前观 2011 全国政协提案》一文中指出，今年要“摒除雷人提案”。也就是说，射门前要先掂量掂量，如果会飞往角旗杆就别射了。

笔者亦曾踢球，脚法奇臭，射门竟能直接射出边线。可每当抬脚欲射，我总觉得球要奔死角而去。不少代表们大概跟我一样，提案前也认定自己的提案能直达百姓心底。只可惜他们的提案水平比我的球技高不了多少。倘若让他们在提案前掂量，他们恐怕是掂量不出自己的提案有多雷人的。如果要他们为雷人提案负责的话，他们宁愿选择不提案。

提高中国足球射门水平要从足球体制着手，而非让他们不射。同理，提高两会提案水平，也当从制度着手，而非让他们不提。

首先是代表的选拔制度。脚臭如笔者之流是入选不了国家队的。可有些代表提案水平低于笔者球技者，却年年当选代表。更有甚者，或年事已高，或智力欠缺，不具备基本议政能力者，亦能当选。所以两会代表们的选拔起码得有个底线，不达标者不可被选为代表。

二是代表的职业问题。国足虽臭，也是由清一色的职业球员组成。人大与政协重要程度固重于国足，其代表却皆为兼职代表。非全职，并未在议政方面投入主要精力，不具备足够提案能力也不足为奇。因此，这种兼职代表的现状有待改变。如果政协因其性质尚无代表专职化的现实可能性，人大代表专职化可先尝试。

三是人大权力问题。国足实实在在地肩负着中国足球走出亚洲的职责，可全国人大贵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却如尚未开锋的钝斧，无法施展应有的威力。如果中国足协已经决定了中国足球的成绩，恐怕国足队员会在球场上坐成一圈聊天。因此，两会一些代表开会也不甚用心。实际上，两会常常是一些人聚会的机会。一聚会，一幽默，雷人提案不就来了么。提高人大在政治过程中的实权，必须成为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

行文至此，笔者也不愿相信两会与中国足球有如此多相同之处。所幸有一关键，两会和中国足球是大大不同的。球员的每脚射门，都会对比赛结果产生直接影响。一脚射偏，前面

* 作者简介：温信赢，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07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的组织就白费了。代表的每次提案，却不一定对政治运行产生直接结果。雷人的提案通常是通不过的，它们产生的危害，远远小于把射门打偏。中国足协虽然昏聩，也从未下令禁止射偏。若不思修改制度而出政策禁绝雷人提案，则又在中国足协之下矣。相反，对雷人提案不妨宽容，这样代表们才更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最后好的提案才能在从众多提案中脱颖而出成为好的政策。

综上，笔者以为，两会的相关制度应当有所改革。如果制度改革合理，两会政治作用前景起码要比中国足球乐观不少。

核灾难离我们远吗？

杨运程*

去年年底，我的三个同学签了日本公司，将要去日本工作。大家都很为他们高兴，还开玩笑说：“日本地震多发，你们要小心。”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级强震，随之而来的是浪高十几米的海啸。顷刻之间，往昔繁华异常的日本整条东部海岸线被巨浪卷成“秃子”。然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12日，位于震区的核电站破坏严重，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日本这次地震所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然而，地震的毁坏力将远远不能和这次地震所导致的次生灾害--核电站爆炸所带来影响深远。全球股市应声跌落，日本股市更是首当其冲，大盘15日暴跌10.6%。

最近几年，发生在地球上的天灾好像异常的多。然天灾终究是人力不可抗拒，而人祸在理论上是可以避免的。且让我们回顾一下，1986年原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1979年美国三里岛堆芯溶解，都是放射性物质向周边扩散的重大核泄漏事故。我们会惊觉，人类不知什么时候就已经在自己头顶悬挂起了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悬挂这把剑的马鬃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

短短一个多世纪，人类一直贪婪而疯狂地掠夺地球资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成了维持现代奢华文明和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缺的能源。

在地球自身这些能源日渐枯竭的境况下，人类开始发展核能。从最初的核武器，到今天应用于医疗、发电等领域，核能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是核能源在为我们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其毁灭一切、吞噬万物的凶险一面。

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贫乏的岛国，供其自身发展的各种能源和原材料均来源于海外。因此，发展核电站成为缓解其能源危机的一种有效手段。而由于大量使用化石能源，导致了地球表面气温上升，温室效益日益严重，海平面不断升高的今天，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由于技术成熟、成本低廉，核能是比风能和太阳能更为简单和廉价的方式。今天，一座座核电站在全球悄悄矗起，核电已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日本核电站就达到54座，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核电站中，美国最多，达104座，法国59座，英国和俄罗斯也都在30座以上。在无可奈何的境况下，我们正与魔鬼同行。

* 作者简介：杨运程，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07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日本核电站的抗震标准，设计抗震能力最大为里氏 7.0 级，然而，在 9 级强震面前，之前设计的抗震标准远未达到。3 月 11 日 9.0 级大地震后，福岛第一核电站一机组 3 月 12 日下午发生爆炸，第二、第三、第四号机组随即均失去有效控制，处于爆炸临界点。3 月 15 日，六座机组中有四座发生爆炸。据最新消息称已有 190 人遭受核辐射。

从眼下看来，最大的灾难并不是地震本身给人类带来的，而是地震造成核电站失去控制，核泄漏带给日本国民的灾难性后果。同时，这种灾难性后果还严重威胁着周边国家的安全。

我国目前共有四座核电站十一个机组运行，除了北京和天津之外，整条东部海岸线还有几十座核电站在建或规划中。据中广核集团某权威人士消息，我国核电站是按照里氏 7.0 级的抗震标准修建。而现在就日本强震后的结果来看，核电站设计抗震能力在里氏 7.0 级是无法保证绝对安全的。国内又有某权威人士昨天面对媒体说：“中国的核电站建设在设计前都会制定好安全预案，在设计时，抗震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其还表示，目前日本主要使用第二代核电技术，没有中国的先进。该人士乐观的依据仿佛是对我国核电技术的高度自信。

如今，面对日本强震后的核电危机，在发达国家都不能做到核电站万无一失的时候，当德国民众因政府延长核电站使用年限而示威的时候，我国核电技术还处于赶超阶段的现状，我国是否应该慎重考虑发展核电项目呢？

我国也被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喜马拉雅地震带所包围着，处于地震频发的地区。然而，我国正运营和在建的核电项目里，绝大部分分布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且赫然有位于云南省者。不久之前，盈江刚刚发生了里氏 5.3 级地震，伤亡数十人。也许，专家们在认证这些项目时已经充分考虑了地震的因素，并作了严密的预案用于防震。从公开的资料可以知道，我国核电站防震等级是里氏 7 级。这是远远不够的，假如发生高于防震设计等级的地震，其核泄漏的危险性将大大提升。万一核泄漏，以我国东南沿海的人口密度，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极大的社会恐慌；以其经济发展地位和 GDP 所占 70% 以上比重的现实，我国经济将受到毁灭性打击，社会发展将出现灾难性倒退；国家和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治理核辐射能力将面临严峻考验。不可否认，日本具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十分优秀的社会动员能力，日本国民具有高度的自律性和公民责任感，在防止核辐射方面具有发达的技术和完备的预案及防护措施。但是，当核泄漏袭来，仍然使得这个国家人心惶惶，东京街头出现混乱抢购，道路被逃亡的汽车堵满的严峻后果，日本经济损失将达到 16-20 万亿日元。对比之下，我国小道消息满天飞，一说日本核辐射将有可能污染中国。随之谣言惑众曰，碘盐可防核辐射，我国各地便出现了一幅“万人空巷”竞相抢购碘盐的疯狂自救场景。更有不法商人，居然将盐囤积居奇，打发国难财，令人唏嘘不已，倍感国民素质堪忧。

这次日本核泄漏事件已经给我们上了一课，核灾难离我们并遥不远。“凡事预则立”，我国政府必须做好应对核危机的一切最坏预案和措施，民众需要更加自律，更加理性和相信政府有应对一切危机的能力。免得万一灾难来临，寒号鸟的悲剧重演。

[责任编辑：李金潼]

聚焦胡锦涛主席访美

【编者按】2010年的中美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年：从经贸摩擦到汇率之争，从黄海军演到南海问题，从对台军售到西藏问题，都使人对中美关系会否失控产生疑虑，也担心这种“高速公路”上出现的拥堵会给两国关系以及经济复苏带来负面影响。

2011年1月18日-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奥巴马以一场罕见的白宫私人晚宴的最高规格为胡锦涛主席的国事访问拉开序幕。在中美关系逐渐被渲染成“G2”的今天，这一场在近来中美摩擦频发背景下的高规格“胡奥会”，对中美两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又将牵动哪些国家的神经？本期青梅煮酒将和您一起聚焦胡锦涛访美的前台幕后。

【中美关系大事记】

1971年7月9日至11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总统对中国进行的首次访问。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

1975年12月1日至5日：

美国总统福特访问中国。

1978年12月16日：

中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这是中美第二个联合公报。

1979年1月1日：

中美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并于年内撤走驻台美军，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即“断交、废约、撤军”。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



1979年7月7日：

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美贸易协定，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

1982年8月17日：

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售台武器。这是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

美国总统里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985年7月22日至31日：

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

1989年2月25日至26日：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9日，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中美两国将加强合作，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

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002年2月21日至22日：

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2002年10月22日至25日：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

2003年12月7日至10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提出了确保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五条原则，布什总统表示赞同。

2005年8月1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首次中美战略对话。

2005年11月19日至21日：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加深互信，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2006年4月18日至21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双方一致认为，中美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双方同意从战略高度和长远

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全面推进 21 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2008 年 8 月 7 日至 11 日：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应邀来华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及其相关活动。



2009 年 4 月 1 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

2009 年 11 月 15 日至 18 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 21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2011 年 1 月胡锦涛访美重点行程】

●1 月 18 日

胡锦涛当晚抵达美国，并前往白宫出席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私人晚宴。

●1 月 19 日

奥巴马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

中美在白宫举行一系列双边会议；

奥巴马和胡锦涛光临微软公司、海尔公司等，与中美商界人士进行座谈会议；

胡锦涛与奥巴马在白宫东厅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

胡锦涛在白宫出席正式国宴。

●1 月 20 日

胡锦涛访问国会山，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领导人会晤。

胡锦涛前往芝加哥，会见了芝加哥市市长戴利。

●1 月 21 日

胡锦涛离开芝加哥，结束对美国的访问。

【众说纷纭】——关于“胡奥峰会”

➤ 媒体看法



的关系。

中美双方第一次站在了平行的、致力于引导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历史新起点上。

——中国《瞭望》

胡锦涛此次访美意在使中国的新超级大国地位得到承认：从现在开始，中国是一个必须要与之对话而且与之共享世界权力的国家了。

——西班牙《国际报》

美方如同迎接一位密友一样迎接胡锦涛，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改善与中国的

——美国《美联社》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受到的高规格接待表明中美已平起平坐，这种地位平等并非源自硬实力，其真正原因是中国的活力和发展趋势。

——英国《卫报》

在中国外交影响不断增大的今天，胡锦涛的这次访问是中国领导人 30 年来对美国的最重要的访问之一。中美间的战略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习惯，这种战略合作建立在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会见、一系列精心制定的议定书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胡锦涛的访美行程也有力地驳斥了一些人认为美国和崛起中的中国必有一战的错误判断。

——黎巴嫩《每日星报》

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女儿同他用汉语交谈，这形象地反映出中国日益增强的软实力。胡锦涛的这次访美之行，显示出中国强劲的经济复苏步伐，及其在美国未来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奥巴马政府也从未掩饰这一点。

——印度《印度时报》

美国和中国能够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达成合作意向，是良好的信号。胡锦涛对美国的此次访问表明，世界经济的两位巨头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方式。

——英国《每日电讯报》

奥巴马政府的目标是促使中国准许人民币升值，但是这方面却没有任何进展。胡锦涛访华盛顿时达成的许多经济合同和交易都需要数月或数年才能生效。在伊朗与朝鲜核武问题上，双方仍然在策略上和战略上有分歧。

——美国《华盛顿邮报》

毫无疑问，这次胡锦涛和奥巴马的会谈可以说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之间首次最重



要的会谈。这样一次高峰访问并不能仅仅从谁得到多、谁得到少这样一个“成本—收益”程式（例如中国得到了面子，美国得到了实利）来分析的。中美两国关系是一对可以决定整个国际关系大局的大国关系。从这个视角看，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方面莫过于两国的再确保，即守住合作底线、避免冷战、继续寻求和推进合作的关系。

——新加坡《联合早报》

➤ 专家看法

从当前形势看，中美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关键的时刻，需要双方同时发出声音说，“坚持下去，我们有志发展积极有效的双边关系”。

——查尔斯·弗里曼（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

我认为中美首脑的这次峰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目前中东包括伊朗、利比亚、埃及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这种形势的背后其实是有美国的影子的。美国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公开的，比如说美国公开支持一些人在微博上反对政府，鼓动一些反政府组织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除了中东的问题需要中美之间协调之外，还有一些中美之间本身的问题，比如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问题，这些都是需要双方去协调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期举行这样一场峰会是很有价值的。

——刘兴华（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讲师）

不论从媒体的评价还是美国的态度来看，这次峰会都是非常重要的。胡锦涛对美国的两次国事访问，美国接待的规格也非常高。不过我们应该撇开形式，看看胡锦涛访美后中美关系好的方面有没有得到发展，坏的方面和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最大的亮点就是说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强化。每次国家元首、领导人出访，随行人员中最多的就是经贸代表团。这次也与美国签订了大额的经贸合同。我觉得经贸关系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方面，也是亮点比较多的方面。但是有些问题并没有通过这次峰会得到解决，包括美国东亚战略调整之后对中国施加了压力，中美之间互信的建设，不是一次峰会就能解决的，而是中美之间的一个长期的较量和磨合的过程。

——刘丰（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讲师）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在现在这个时期非常敏感，这次峰会对于缓和两国关系有些作用，但是有很多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还需要更长期的磨合才能解决。

——徐振伟（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讲师）

有人说胡的访美是继 1979 年邓的访美后中美关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当然 1997 年也有江的访美。主要是在一个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国 GDP 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并且美国处在深刻的危机当中。当然美国的经济似乎在复苏，不过也没有完全摆脱危机。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世界第二和世界第一见面，而且双方讨论的是事关全球性的问题。这个在冷战时期美苏都没有做到。美苏举办过高级元首会晤，但是他们解决的是军备问题。但这次不一样，双方谈及的不仅是中美关系，而且涉及很多全球性问题。不论

是低级政治还是高级政治，议题之广是包括以前美苏会晤都没有过的。这次会议外界评价以积极的评价居多，但是双方这次只是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最初的期望是双方能发表一个联合公报，因为从 1972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石就是三个联合公报，因此大家都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下能发表新的联合公报，为下一个三十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打下基础。1979 年中美建交以来签署的联合公报使得中美这三十年来关系没有太大变化，但也不是没有挫折——比如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等，但总体还是保持了双方关系的基本正常。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联合公报来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构建一个新的政治框架，但是很遗憾这个愿望没有达成。这也说明双方之间存在着分歧。这次会谈的成功也只是表面上的事情。但这个联合声明也说明双方有共同之处。分歧的存在表明双方的不同，不同就有可能导致冲突，冲突有时候可能恶化。不过双方对各自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有更多的交流。

——霍特（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讲师）



➤ 同学看法

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与国家力量的消长面前，美国人选择了偃旗息鼓、韬光养晦。两国的联合声明公开承认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对方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是美国第一次承认不同文明的价值取向，第一次不再一味强行推销其固有的美式民主。在这次博弈中，美国人暂时退却，中国人略占上风，但是千万不要盲目自大。中国的腾飞需要夜以继日的厚积，然后才能勃然而起。

——陈凯（08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中美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两国在经贸、军事等多个领域都需要合作，美国和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两国关系不稳势必影响双方合作，损害两方利益。胡锦涛的美国之行，被广泛视为中美关系在 2011 年步入积极轨道的一个良好开端。

——江育恒（09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涛哥此次访美为今后一段时间中美两国关系定下基调，是“十二五”期间中美关系的预热，同时也会在美国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拉奥巴马一把。

——陈超（09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胡主席访美，提及最多的就是构建中美互信关系。诚然，实力迅速增长的中国势必被美国定为潜在的对手，两国间的安全困境将日益凸显，提高两国互信有利于缓解这种困境。但是，中美越过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达成互信，不是一次出访就能解决的，甚

至不是凭单方面的意愿就能构建的。真正的答案恐怕只有等待历史给出。

——陈宁（09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正常的中美关系应该是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其中何者占主流则见仁见智），因此我们不必强求双方关系一路“和谐”。胡主席此次访美，给予美国巨额的经贸订单，可是能否真正推动两国关系向良性发展，还是个未知数。中方得到的可能只是暂时的虚名，相反，美方得到了实利。这次胡主席访美有象征意义，甚至也有可能解决或者缓和一些表面的问题，但很难对中美关系的大局产生可持续的和实质性的作用。



——姜忆楠（09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在我看来，胡总这次的访美之行代表了目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发展的状况和趋势。从美方的接待规格来看，此次美方对胡总的访问活动是极其重视的。从双方会谈的内容来看，无疑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的。此次访问在实质上对于美方的强硬派是一个打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敲醒了中国民间的部分不理性声音：美国至少在目前并未因为经济危机或者几场战争就一蹶不振，霸主的主动地位也未丧失过；中国固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地位和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但是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

大批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仍明显存在，国内的问题也是异常复杂；中国与美国现阶段在战略目标上的矛盾和冲突并未明显激化，两者之间的共同利益还是比较广泛的分布于各个领域，双方“长期合作、斗争不断、斗而不破”的格局仍将存在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过高估计这次访问的影响，对于今后的中美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仍应实事求是、不断地用发展的眼光去具体分析，去迎接新的挑战 and 机遇。

——李碛（0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这次中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开创了中美合作的新局面，有利于实现互利双赢。希望中美关系的改善，能够造福两国人民，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

——龚秀娟（09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众说纷纭】——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

➤ 媒体看法

今天中美两国关系和三十多年前相比正面临着一种新的结构，三十多年前是中、美、苏三角结构，而今天则是中、美两国间的一个事实上的 G2（中美共治）结构。中美两国如何

选择，影响的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而是整个国际关系。今后的问题在于，中美两国如何在这个事实上的 G2 结构内部互动？两国关系的制度化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美两国间的合作再保证可能要不断重复进行，不断探索经验教训，两国关系才能走上制度化稳定的轨道，才能使得 G2 结构成为有助于人类和平的新结构。

——新加坡《联合早报》

如果中国和美国注册 Facebook 个人档案的话，他们的关系状态会显示：“复杂”，既具有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也有买方与卖方的关系，这两个世界超级大国至少可以算得上是“同床异梦”。一方面，他们是通过对方的成功实现既得利益的商业伙伴。另一方面，他们是在一些固有问题上激烈对抗的对手。商务部长骆家辉日前称中美这种关系“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贸易关系。”

——美国 CNN

现时的中美关系就如华尔街大行一样“大得倒不得”，但双方过去两年在经济、军事及战略方面的关系均走下坡路。美国的经济开始复苏，对华越来越强硬，并鼓动周边国家和中国对抗。



——英国《金融时报》

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建立互信。化解不信任的途径之一在于承认现实，共同努力取得具体成果，从而体现双方善意和合作的好处。

——美国《纽约时报》

对华关系是奥巴马政府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当任何一个国家获得经济实力时，都不可避免地会利用新影响力服务于自己的利益。现在轮到中国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

中国和美国都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就他们有分歧的问题协调立场。所有问题的根源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提升。美国正在经历衰退，这是历史性的时刻。中国力求在许多方面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则不想向中国让出头把交椅，于是便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实现其目标。在中国还没有达到目标的时候，这种情况将不止持续一年或两年，而是几十年，同时，美国也不会顺从中国在世界空间中的领导地位。

——俄罗斯《俄罗斯之声》

➤ 专家看法

我不赞同所谓 Chimerica 等类似 G2 这样的提法，因为中国从来不希望称霸，而是希望朝着全球均衡的方向发展。如果强调 G2，会引起中国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猜疑。与此相应的，我也不赞同“崛起论”，崛起的意义和中国的外交战略并不相称。中国外交风格



不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而是比较温和、平衡。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与其他任何两国的双边关系一样，但不会有 G2 这样一个事物出现。我们两国都拒绝这一概念。

——希拉里·克林顿（美国国务卿）

中美关系存在三个死结：一是政治，二是经济，三是战略。有的是长期以来的旧死结，有的是新结的，要解开这些死结不容易，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但使其松一松，是很必要的，对我们也有好处。

——张蕴岭（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奥巴马总统上任时曾表示，他的外交政策要务之一是改进与中国的关系。但是，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赴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两国关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比那时更糟……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率先强劲复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上美国经济复苏迟缓乏力，使得许多中国人误以为美国正在衰落。这种念头，加上内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高层则在为 2012 年向第五代领导人移交权力作准备，都构成了要求外交政策更强硬的呼声……偏离崛起中大国的明智战略、违背邓小平所说的外交上韬光养晦的智慧之言，中国失算了。胡锦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可能有助于事态好转，但只要中国人因为基于美国正在衰败的错误认识而继续妄自尊大，中美关系就很难顺畅。

——约瑟夫·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我认为现在看不清楚，外交辞令当然会说，中美“除了合作，别无选择”，但是双方毕竟还在很大层面上是竞争对立的关系，很难说今后到底是合作为主，还是竞争为主。在话语层面，我们都可以说要消除战略互疑，实现战略互信，但是双方有这么多激烈的分歧，都不会让步，所以都是基本无解的。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现在中美之间的交流不但越来越多，而且也越来越制度化，比如有中美之间经济战略的高层对话，双方谈论的议题也很广泛，包括经济和战略方面。这样就会减少双方误判的可能性，而且在交流的过程中双方，特别是美方，会逐渐学会怎样接纳一个不同的文化。在欧美历史中，挑战国都是“同制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一个“异制文明”能向欧美文明挑战。并且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与西方如此迥异的一个国家，双方之间发生误判的可能性很高。只要双方都学会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加强沟通和了解，双方虽然不能排除发生局部摩擦的可能性甚至不排除双方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但是双方应该不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冲突，我们也会利用良好的契机发展双边关系。当然中国也要学会真正的“和平崛起”，尤其是 2009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外界常常评论说中国变得咄咄逼人了。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坚持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说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有其正确合理的含义在内。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应该会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不

仅符合两国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这两个能够决定人类命运的国家应该能体会到这一点。而且多极化趋势现在更加明显，所以中美关系还是能够和平稳定地发展。用一句老话，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霍特（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讲师）

我们（中国）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可能会跟奥巴马上任时不太一样，很多政策会调整，中国在中美关系方面会有更大的压力。在现在这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下，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抗和冲突暂时还没有看到。虽然有人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美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上升势头的增强，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可能会越来越强。

——刘丰（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讲师）

➤ 同学看法

不管中国愿意与否，与美国共挑扁担都是必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从空间和时间上分配责任和权力，即在哪些领域承担责任要求权力，何时挑起，何时搭车。

——梁哲（08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G2”应是中美之未来，而非中美之现实。无论美国如何强调中国之地位显赫，中国都应保持掌握资源与全球责任的协调。

——陈名明（08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虽然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霸权产生了威胁，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成为这个超级大国的继续发展的重要助推力。因此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要处理好中美关系，通过商贸关系套住美国，并通过商贸关系的加深促使中美关系在更广泛的领域发展，



使中美在更广的领域成为共同利益者。虽然中美因为各种利益，尤其中美之间还存在着霸权国与潜在挑战国的关系，两者的冲突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更多，而且表现最明显的贸易摩擦也讲从传统的倾销、反倾销向更高层次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变。但相信中美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对方的利益与重要关切，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互赢而非零和关系。21世纪不会成为中国的世纪，也不会成为G2的中美国时代，但中美两大国的关系不仅影响中美两国，也将影响整个世界。对于这一点中美两国领导人比我们更清楚，因此相信中美会处理好两



国关系，使之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并尽可能促进世界发展与和平，无论这样的世界是叫“美国治下的和平”还是“和谐世界”。

——朱俊帅（09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中国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经济上的合作是美国经济复苏与发展的需要，军事上的遏制是美国维持霸权的需要，因此不要对美国抱有幻想，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够做到崛起。

——董祚壮（09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中国、美国，是两个世界上最具经济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中美关系俨然成为 21 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双边外交关系，就连这次的奥巴马盛大欢迎晚宴都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含义——G2。这次的中美高层交流无疑会对双边经济贸易、地区和平（无核化、反恐反海盗等）等产生积极影响。但是，不可被舆论的乐观情绪淹没，中国的崛起必然是对美国霸权的严重威胁，美对中的遏制防范是必然的，不要总是用“和谐”、“问题的主要方面”等掩饰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尴尬。诚然，利益的互补促进合作，但进一步的非完全对称相互依赖将导致利益冲突的加剧和权力强弱的对比。

——权贤美（09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责任编辑：阮艳婷]

周恩来总理外交趣闻两则

（一）1971 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 5000 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二）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风趣著称，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鲁晓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编者按】写作和发表国际关系类文章有助于深化理解理论知识，对于加强学术交流也大有助益。诸种国际关系类文章中，评论作为一种基本的写作形式，受到人们较多的关注。然而，怎样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评论，具体的写作又应该如何展开，无疑成为困扰广大国际关系研究者的问题。鉴于此，本刊“他山之石”栏目刊载马丁·史密斯与刘丰两位作者撰写的关于写作和发表国际关系评论的方法论文章，以飨读者。马丁·史密斯教授的《如何发表政治学评论文章》一文从宏观上介绍了政治学评论文章的分类、写作目标和发表的注意事项。刘丰博士的《如何写作国际关系类书评》一文则依照书评的写作目的、专业书籍的阅读和评价、书评结构这一条逻辑线索，对于写作国际关系类书评进行了实用而独到的点拨。

如何发表政治学评论文章

马丁 J·史密斯* 著 姜忆楠** 译

很多人认为，评论文章无论是在重要性抑或是在质量上都比不上第一手研究的文章。期刊的匿名评审过程强化了这种观点，导致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不根据第一手研究写作的论文没有多大的价值。不过，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评论文章对知识的发展同样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评论文章与其他文章和书籍一样，其优劣并非取决于文章本身的类型，而是取决于文章的质量。事实上，评论文章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被引用最多的出版物。一些评论文章在它们涉及的研究领域与它们分析该领域的方法上都具有权威性，好的评论文章还可以界定一项新的研究议程。事实上，在所谓的“硬科学”（hard sciences）领域，评论文章通过汇集相关研究主题下的所有数据而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关于该领域取得成就的概览，因而常常被视为是对某个科学研究问题做出了主要的贡献。一篇好的政治学评论文章具有相似的影响。评论文章和学术论文的界限是很模糊的。重要的政治学评论文章建立在对政治学中某一议题、主题或研究方法的创造性理解之上。

我们首先要记住的是，评论文章有不同的类型。最简单直接的是评论一本书。这种评论文章从几百字到一千多字不等，它是一种很好的发表文章的方式。这种评论通常不会经过匿名审阅，篇幅相对较短，并且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发表文章的做法。此外，由于出版商收到的著作通常比审稿人多，因此编辑一般会主动寻找匿名评阅专家评论该书。通常这种类型的书评的重点是概括全书内容，并以一种友善的方式对该书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评论。“狂扁”一本书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评论通常是主观的，融入了评论者个人的情感和精神。不过，也无需因此拒绝建设性的批评。有一点很重要，不要写作太多的简单书评。这种评论有用但费时，而且也没有人因为写作书评的数量而获得教职。

更多的评论文章通常涉及到了多本拥有共同主题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加长版

* 作者简介：马丁 J·史密斯（Martin J. Smith），英国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政治学系教授，《政治学研究》（Political Studies）主编。

** 译者简介：姜忆楠，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09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的书评，篇幅不少于 1000 字，有些甚至达到 5000 字。尽管在某些方面它们可能是最简单的书评，但思考如何去完成一篇长的书评仍然很重要。更长的篇幅意味着，书评不仅仅是对著作内容的概括，还应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背景下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书评提供了论述书中涉及的争论的机会。一篇加长的书评意味着，你有可能从中发展出自己关于某一特定问题的视角和观点。在写这种书评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思考，你想从所评论的书中得出什么样的主题，以及将评论作为一种具有明确方法的写文章的方式。

还要记住的是，许多期刊杂志需要匿名评审人，而你可以向某一种期刊注册表明自己对成为审稿人有兴趣。有时这确实会带给你长期评论文章的权利。《政治研究评论》（Political Studies Review）就是这种情况，它的编辑就很乐于接受评论文章，或者是研究讨论综述的建议——在这种研讨会上多位作者讨论一本或几本著作。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主意，请联系编辑。

更常见的评论文章，其篇幅与平常的论文无异；我认为，其意义也应该与学术论文等价。这种类型的评论文章并非旨在关注数量有限的文章和书籍，而是要真正完成一篇论文，进而实现如下目标：

- 回顾该学科或其分支学科当前的发展水平；
- 检验新的理论或经验研究成果；
- 向政治学研究者介绍一些诸如哲学或地理等其他学科可以补充政治学研究的成果；
- 关注一个具体的经验问题并评论多个学科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 回顾一个研究领域或子领域，就该领域的发展或新的研究议程提出自己的建议。

因此，一篇好的评论文章能够引发某一具体领域的辩论，勾勒出新的研究领域，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影响认识或发展一个领域知识的方式。

写作一篇好的评论文章需要相当多的见解和技巧。好的评论文章会将大量的工作压缩在 8000 字的篇幅内，这需要作者对文献的熟练掌握；不管是在解释方式，还是在对研究的新方式的建议上，出色的评论文章总能够将新的东西添加到文献中。重要的是，评论文章并非是对这些作者论述了什么的简单描述，而是拓展这些研究的主题，弥补其遗漏之处。一篇评论文章应该能够试着总结出文献的主体，将文献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这需要提炼出文献的关键贡献和不足之处以及它未来的发展方向。

写作评论文章并不只有一种方法。然而，重要的是要确保评论文章应该按照写作的主题而非所评书籍来组织结构框架。主题可以是梳理某一（或某些）概念的演变历程或者分析不同的研究路径。对于一篇好的文献，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文献体现出的发展意识。一篇好的评论文章会依据现有文献提出新的观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思考论据，或者取得理论或概念上的进展。如果一篇评论文章只是概括总结，没有在原书基础上的继续发展，那么这篇评论



将只是一篇评论，缺乏新的知识贡献。这并不是说评论文章会在某些方面与普通的论文不同，但评论文章通常会涉及到更大的范围，并且可能在论据方面缺少创新；一般而言，研究型论文会对某一具体问题集中关注。

评论文章很适合作为首次发表作品的方式，对于学习如何将大量材料组织成为一篇具有可读性和较短篇幅的论文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为什么一位刚入门的“新手”要考虑写评论文章，其实有很多原因。首先，写评论文章不需要进行第一手研究，而且涉及的资源有限，使得搜集资料相对容易。其次，大多数学位论文都是以文献综述开头，这样可以相对简单的将文献综述发展为评论。在你的论文中，你可以在文章开头就展示出全文概貌，简洁明晰地表达自己对该领域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见解。第三，这是在某一具体领域得到专家声誉的好方法。评论文章会受到关注，这样你的名字就会和这一领域联系起来。最后，能够在某一领域发表评论文章从建立信誉和争取研究经费的角度讲是很有用的。在争取研究项目的过程中，你需要展示自己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掌握，在某一领域的专长和做出重要预见的能力。一篇评论文章可以让你完成所有这些事情，进而争取到研究经费。

如果你正在考虑撰写评论文章，和写作其他出版物一样，首先要做调查研究。不是所有的杂志期刊都会刊登评论文章，或者它们至少不会专门开辟一档评论栏目，因此你需要查阅相关的杂志，考察哪些杂志发表评论以及它们组织评论文章的方式。它们对评论文章是否要求反映该学科的最新进展，是否是最新的成果？他们倾向于评论一般性理论还是对最新的研究成果感兴趣？联系并咨询该杂志的编辑是否对某一领域的评论感兴趣通常是一个好的办法。英国政治协会（PSA）主办的所有刊物都辟有某种形式的评论栏目，因此，去看一看哪些评论会被发表，你的工作成果最适合在哪些杂志上发表。

一些评论文章在提交时可能不会将自身定位成一篇评论文章。如果一篇评论文章使用了新的研究思路，或者得出了新的观点或理论方法，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原创性研究，可以像其他期刊文章一样发表。因此，你需要考虑如何展示你的评论，你得出了什么样的观点。你基本上是依据现有的文献发展出原创性的论文，还是围绕文献的进展进行陈述说明？接下来补充背景以确保你的文章容易被大家理解。然后你需要思考你的主题，努力彰显你的研究工作的独特之处。请一部分人阅读这篇评论，并参考他们提出的意见。评论文章经常会像学术论文一样经过匿名审阅，因此，必须考虑到评阅过程，使评论文章符合审稿人的要求。在评阅过程中，重要的是要区分所投文章是明确的评论性文章还是普通类型的研究论文。如果是后者，就需要向审稿人展示论文对于目前的学术争论做出了哪些原创性贡献。

评论文章很难写，但是评论文章如果做得好且对于学科有独特的贡献的话，就会得到广泛的尊敬并被大量引用。正因为评论文章如此重要，人们才需要对评论文章投入严肃的关注，思考如何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发展出对该领域的概述。此外，书评与评论文章是迈向作品发表之路的绝佳方式。与同事和导师交流，思考如何将你的研究工作做成评论性的文章，也许会影响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议程。



如何写作国际关系类书评

刘丰*

有感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书评类作品不够繁荣,我在这两年的教学中一直尝试着将写作书评作为研究生课堂教学的一部分,以便促使学生们认真阅读一本英文学术专著,了解研究设计的完整步骤并锻炼写作能力。写作此文是为了让学生们在写作时有一个参照的标准。好书评的风格应该是灵活自如而非程式化的,当然,一些基本要素写作时可以参考。

书评的目的

写作学术书评不仅是向人们介绍这本书的内容,而且要阐述这本书是否成功地达到了其试图达到的目的。指定书评写作是为了让学生们更加仔细地、批判性地阅读一本书。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文章不乏书评类作品,它们或是对一本书的评介,或是对几本主题相近著作的综述。在一篇书评中,评论者一般需要**描述**书中的主要内容,**分析**这本书试图达到的目的,并**表达**自己观点。

读懂一本书

读懂一本书是写作书评的前提。你在阅读任何一本学术书籍时可以带着下列问题:

1. 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什么?

作者们一般会明确阐述自己写作一本书的目的,尤其是在书的导论和序言部分。一本学术专著的目的一般是解决学术界的争论或现实世界的重大困惑,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2. 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书的导论部分一般会陈述这些观点,并且会就每一章的主要内容做一简介。

3. 作者用来论证或支持其主要观点的证据有哪些?这些证据是否可信?

所有的著作都是可以批评的,但是批评一定要有的放矢。从逻辑和经验两个方面思考为何一些观点可信或者不可信,并且判断作者是否对其观点作出了充分的论证。

4. 这本书与相关主题的其他书相比有何价值?

这本书是填补了空白还是增加了新的信息?哪些读者会对这本书感兴趣?

5. 作者是否具备写作这样一本书所需的专业知识?

书评的结构

写作并无一定之规,下面的结构仅仅作参考:

标题:评论者需要构想一个概括性极强且引人注目的正标题。

引言:与一般的学术论文一样,评论者在引言中论述写作这篇评论的背景和目的,以及

*作者简介: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



评论的主要内容。引言第一段一般会告诉读者你所评论的这本书的主要信息(作者、标题)。如果篇幅允许,也可以用几句话对书的主要内容、目的以及你的评价做一概括。

背景信息:第一部分可以就该书所涉及的学术背景进行讨论,使读者了解这本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且可以设定评判该书的标准。

内容概述:该书主要内容的综述,在说明作者的核心观点时,尽可能直接引用书中的原话,并添加注释,便于读者查找。

评价:一份书评的核心部分应该是评论者对该书的评价。在这个部分,评论者可以讨论一系列问题,比如作者是否实现了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否解决了试图回答的问题,书中遗漏了哪些重要内容的讨论,该书与其他相关主题著作相比有何优劣,哪些观点并未充分论证而不足为信,该书对后续研究的推进有何启示。需要注意的是,评论者的批评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而不是漫无边际的。尤其要注意的是,区分你自己的观点和作者的观点,以免读者混淆。

结论:评论者可以将评论者涉及的问题或者研究的进展做一总结性评论。

评判的标准

以上概括了一篇完整的学术书评的主要内容,当然,不同类型的杂志上刊载的书评侧重点是不同的,或侧重介绍,或侧重评论。通常,好的书评不应只是对书的内容的概括和梳理,因此评论可以占到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篇幅。既然评论是主要内容,那么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评判一本书的价值?下面是一些可供参考的标准:

1. 该书所涉及的议题在国际关系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如何?
2. 作者在该领域的学术积累是否全面和详尽?
3. 作者的论述是否囊括了充分的证据,或者忽视了哪些必要的证据?
4. 作者所使用的方法是否足以达到其研究目的,有何优缺点?
5. 写作风格是否清晰、明确和有趣?
6. 这本书与该领域的其他著作相比有何突破?
7. 这本书对所涉及主题有何贡献?
8. 哪些人可以从这本书中受益?

[责任编辑:姜忆楠]



莱斯大学留学记

孙芳露*

怀揣着梦想，我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虽然对家人、对朋友有万分的不舍，但我仍然笑着跟他们说“再见”，因为我相信这条路对我来说是正确的，他们应该为我感到高兴。然而，生活不是臆想，只有体验过才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学，来到这儿的第二天，还没来得及及熟悉新的环境，甚至连去学校的路都还不认识，我就开始了为期两周的数学集训，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活。

这边的学习强度远比国内大得多。虽然我只选了三门课（这是最低要求），一门理论课，一门方法论课，一门数学课，但是仍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理论课的阅读量大，每周最少200页材料，多的时候可能要念两三本书，每个星期交一份3页的阅读报告。方法论课阅读材料相对少一些，但是作业千奇百怪。有时候，老师给一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让我们提炼研究假设；有时候让我们为某篇公开发表的论文重新写文献综述或者导论；有时候让我们画因果链图。数学课，老师不仅教我们怎么应用一些数学模型和数学软件，更要让我们明白在什么样的数据结构、前提假设下才可以用，什么情况下用是错误的。要领会这些，唯一的办法就是翻来覆去的练习。这时候宁愿把自己当傻子，也不要不懂装懂。虽然一些数学问题只需要用 Stata 或者 Mathematica 一个简单的命令就可以解决，但老师却要求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手算，或者自己编写程序。也因为这样，每周的数学作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整个政治学只有四个新生，每门课的学生少则两三个，多则四五个，除了数学课，其他两门课都采用 Seminar 的方式。这样的环境容不得我们有半点偷工减料的机会，做没做功课、材料领会到何种程度，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为了完成学习任务，大家每天的休息时间都不会超过四个小时，熬夜和通宵是常事。大家每天一睁开眼就开始与时间赛跑。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不会因为你是国际学生而降低要求，更不会因为任务太重而给与减负。老师说：“我们的责任就是不断挑战你们的极限，发掘你们的潜能。多年后，你回过头来，会发现，原来你做到了自己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都没有时间去想以后的事情，现在最要紧的就是“生存”。

在对学生的培养方面，我想与国内高校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对研究方法的重视。Rice 的课程安排是方法论至少修两个学期，数学课至少三个学期。如果还有意进一步学习，可以去经济学院、数学院修课，这些都非常自由。方法论的学习中就不免涉及到各种计算机软件的应用，主要包括 Stata、R、Mathematica、Matlab，这些软件的灵活性比较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编写特定的程序。SPSS，老师称之为“傻瓜软件”，即使不明白为什么，鼠标点

* 作者简介：孙芳露，女，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政治学系 2010 级研究生，2010 年 6 月毕业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点也能得到分析结果，所以这边不提倡在学生的培养阶段使用。当然，老师并不要求大家对所有的软件都精通，这也不是方法论学习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明白每种软件长于分析哪些类型的数据，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对知识面的广度的重视。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主修方向（major），此外，至少还有一个辅修方向（minor）。其实，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对两个方向的要求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此外，因为 Rice 政治学规模比较小，师生比例还算高，再加上每门课都有助教，每个人获得资源相对比较多。老师们把我们当作他们的产品，因而愿意在我们身上花时间和精力，尽量做到对每个人的培养都是量身定做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也正因为他们对我们这些“产品”的质量的重视，“劣质品”就会毫不犹豫地淘汰。为了追踪“产品”的质量，每年都会有资格考，只有通过所有的资格考，你才有继续学习的机会。能来到这儿学习是幸运的，但是这份幸运需要自己用努力和汗水去维系，否则就会随时从你的眼前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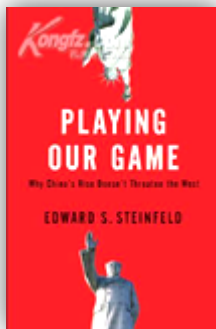
留学在外，一个大的挑战是语言。为此我们会花上数倍的时间去完成与别人等量的作业。而且，在课堂上，蹩脚的英文让我们无从开口，就像一个傻子一样被排除在大家的讨论一样。

为什么我们在国内学习了十多年的英文却到用时方恨少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平常只学不用。英文就像任何一门技术，只学不用或者疏于练习就是纸上谈兵。语言更是一门艺术，在使用时需要我们仔细斟酌语境。例如，我们在回答诸如“Can you……”的问题时，常常会使用“of course”。从我们开始学英文开始，书本上就是这样写的。事实上，美国人很少会这么回答，因为“of course”的言下之意就是“Are you an idiot? You should take it for granted.”，因此很不礼貌。再如，我们在表达“我知道”或者“我明白”时会说“I know……”，但是“know”的言下之意“I do not need you to tell me any more.”，因此用“I am aware of it.”会更好。这些都得靠自己仔细观察、慢慢体会。

在这儿半年的生活，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不只是专业知识，更多的是如何生存和生活。学习和研究的世界是孤独的，我们必须耐得住寂寞。然而，人又是社会性的。在国内，大家都有家人宠着，有朋友护着。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们的人生似乎从零开始一样，从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中挑出自己的第一个朋友，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即使一个不经意的微笑、一句普通的问候会让我觉得十分温暖。这一切一切，我心存感激。努力把这份幸运和幸福持续下去就是最好的珍惜。

[责任编辑：陈冲]

新书架（一）



爱德华 斯坦费尔德 著：《玩我们的游戏：中国的崛起为什么不会威胁西方？》，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Edward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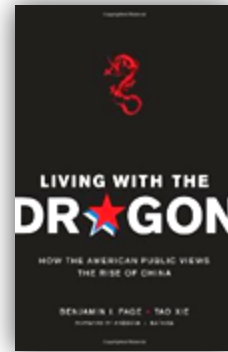
传统上，很多西方人士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会削弱美国的地位，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衰落。但本书的作者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将自身融入西方经济秩序，按照西方规则行事，使西方公司和日常制度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强化。外部世界使中国的发展获益颇多，但其所带来的“破坏效应”也不可小觑。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将国内经济和制度的改造“外包”给了外国公司及外国制定规则的权威。作者认为中国正按照美国的模式在发展自己的经济，尽管中国有巨大的产出，但是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并且基本没有社会安全网络。“沃尔玛化”并不是亚洲制造业大国对西方所做的事情，而是西方改造中国的方式。从外包到能源，作者以犀利而丰富的研究论述颠覆了传统的思维，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赫伯特 伊 主编：《中国崛起——挑战还是机遇？》，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0年。(Herbert S. Yee ed., *China's Rise - Threat or Opportunity?* London: Routledge, 2010.)



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显著增长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随之而来的是有关“中国崛起”概念的变化。国际社会经历了由视中国为威胁的观点到更加多元的视角，认为中国在经济复苏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在世界事务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显著促进了科技进步。本书认为，只有当中国增长的实力地位被其他主要大国及其邻国所接受或者至少是容忍的时候，中国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本书给出了中国崛起是如何为各种各样的国家和地区所感知的全面概述，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邻国，其他世界强国，中国的港澳台地区，以及中国将在其中发挥意想不到作用的世界其他地区，例如中东，从而填补了现有文献的主要缺陷。同时，本书也考察了西方媒体中中国观念的变化。总的来说，相较于之前的紧张与担忧，本书更多地展现了许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肯定。

本杰明·佩奇、谢涛 编著：《与龙共存：美国公众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0年。
(Benjamin I. Page and Tao Xie, eds., *Living with the Dragon: How the American Public Views the Rise of Chin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美国人不仅不信任并且鄙视中国。考虑到中国“暴力政治”的历史传统，空前的经济增长和不断上升的军事力量，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强的市场竞争对手和最具挑战性的全球威胁。然而，充分考察美国的民意却得出相反的结论。通过仔细分析所有有效的民意调查，本书作者发现大多数美国人更愿意与中国和平接触，并且公众观点表现出惊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只有在应对重大事件和新信息的时候才会发生改变。尽管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经济预计将会像美国那么强大而感到不快，但他们还是准备与之共存。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及其对美国人工作和工资的影响，且“中国制造”的质量和安全性问题，都是美国人关切的事情。然而，如果中国改善环境和加强对工作场所的保护，美国人是愿意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他们还认为，美国应该通过与中国的邻国——例如日本——结盟的方式来“平衡”中国的力量，但他们反对采取军事行动去保护台湾。作者仔细考察了这些与中国有关的事实，并结合了当前美国在外交和政策上的争论。这对于我们了解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真实态度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古原俊井、詹姆斯·霍姆斯 编著：《太平洋上的红星：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海洋战略的挑战》，安纳波利斯：海军协会出版社，2010年。(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 Holmes, eds., *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本书作者通过将亚洲的知识、选取汉语中关于海军作战经验文献的能力以及海权理论的专长紧密结合，对中国崛起为一个海上强国将如何影响美国在亚洲的海洋战略做出了评估。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奠定对美国在亚洲海上优势地位进行持续挑战的基础，并且支持了阿尔弗雷德·泰勒·马汉的海权理论所提出的假说，而这一理论目前风行中国。本书仔细研究了关于海洋的战略思想如何塑造了北京的考量，并将中国地缘政治困境与一个世纪前的独裁德国做了对比。本书考察了中国海军的运作理念，战略战术，战舰性能并评价了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舰队。最后作者得出结论，除非华盛顿适应这一局面，否则中国将对美国的战略地位形成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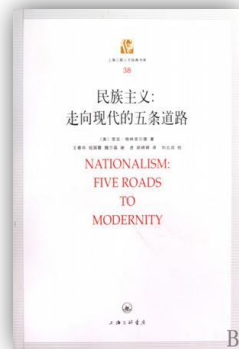
[美]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美]西德尼·塔罗 (Sidney Tarrow):《抗争政治》(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这是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罗两位社会运动与抗争政治巨擘用他们的一生探索社会运动、民主化、民族主义和革命所整合的抗争政治理论。作者在本书中讨论了“抗争政治”的各种形式,包括革命、社会运动、宗教和伦理冲突、民族主义和公民权利以及跨界运动等,它还为各种不同抗争的研究、比较和解释提供了一套分析

工具和程序。“抗争政治”的解释框架有其广泛的适用性,其经验基础不仅来自欧洲,还扩展至拉美、东欧、中亚和俄罗斯;作者在书中分析了历史上和当前的许多案例,包括“二战”后的波兰、巴以冲突、本·拉登问题和苏丹内战,并将民主政体、非民主政体和国家能力强、低四个象限纳入其中。本书向读者提供了一种社会和政治分析的清晰范式,且对于研究发展中国家转型期的政治社会现象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 (Liah Greenfeld):《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民族主义为何以及如何出现?在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的过程中它为何以及是如何转型的?不同形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制度性的习惯与文化模式,并如何塑造了以民族自居的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本书试图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书中的基本假设是,民族主义是这个世界的根基。本书所用的“民族主义”是总称,包括民族认同(或民族性)与民族意识,以及基于这二者的集合体——民族——相关的现象,它偶尔也用来指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所依托的明确的意识形态,但除非特别说明,它与民族爱国主义的政治行动主义仇外变种无涉。作者认为“民族主义”并非一种凭空而来的观念,而是与之前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以及整个国际环境相关;它也并不具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基础,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条件下表现为不同的内涵和路径。本书对我们增进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解大有裨益。



(李金潼 董柞壮 供稿)

[责任编辑:董柞壮]

国际关系论文工作坊

2011 年第 1 期：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

一、活动简介

为了活跃我院学术研究氛围，搭建师生交流平台，由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主办的“论文工作坊”于 2010 年 12 月全面启动。“论文工作坊”旨在为我院师生提供一个提升学术作品品质、拓宽研究视野、启发研究思维的学术交流平台。此活动每月开展一次，故也称为“每月工作坊”（Monthly Workshop）。入选“论文工作坊”的优秀论文在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将以特刊的形式发表在《新视界》杂志上，并向论文作者颁发纪念奖品。首期论坛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成功举办，活动的主题是“国际问题研究——多元的方法与视角”，2011 年第 1 期论坛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成功举办，主题为“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两次活动均吸引了国际关系系内外 30 余名师生的参与。2011 年“论文工作坊”第 2 期论坛拟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举行，主题为“国际关系系 2011 届毕业生论文‘预答辩’会”，欢迎参加。

二、本期论坛简报

2011 年 3 月 11 日晚上 6:30，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主办的“国际关系论文工作坊”（Monthly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范孙楼 440 教室成功举行。本次论文工作坊邀请到国际关系系王翠文老师担任点评嘉宾，国际关系系大一至研一的 20 多位同学参加了本次论坛。国际关系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邓子立和陈冲两位同学分别向大家汇报了自己的研究设计和论文，并与参



加工作坊的同学们进行了激烈的互动讨论，王老师的精彩点评更是将本次论坛推向了高潮。

在主持人简短致辞后，两位同学依次展示了自己的研究设计和论文。首先汇报的邓子立同学，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双边 FTA 战略及其对东亚一体化的影响（提纲）》。邓子立同学首先介绍了亚太地区的 FTA 发展情况，然后分析了中国的 FTA 战略的目标、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 FTA 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他认为，由于中日之间存在 FTA 发生的模式和伙伴之争，中国的 FTA 战略对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并不一定发挥积极作用。由于邓子立同学在最后的总结中对新双边主义对东亚一体化的影响持悲观态度，而文中给出的一个事例却是对新双边主义对促进区域一体化有积极作用的佐证，因而在同学们中引起了一些

困惑。通过大家的讨论，得出了很多有用的建议，不仅对邓子立同学论文的修改有帮助，而且也让学生在讨论中开拓了自己的思维。陈冲同学向大家汇报了他的论文《国际危机调停供需因素的量化分析：解释调停的发生和效果》。在文中，他将国际危机调停的发生和结果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之中，分析了影响调停发生和结果的“背景因素”、“需求方因素”和“供给方因素”的作用机制，并利用国际危机行为（ICB）数据用大样本统计方法检验了他所提出的假设。陈冲同学对调停结果的研究特别注重了调停案例的“选择偏差”，因此他使用了赫克曼选择模型（Heckman Selection Model）进行回归分析。围绕这篇论文，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特别是在自变量的设置上，大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例如，文中关于调停供给方因素的测量不够准确，在变量的内部效度上还有待提高，特别是数据库中关于调停者信息的缺失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同学们的讨论中不时有很多中肯的意见让大家眼前一亮，将讨论达推向了高潮。



王翠文老师的点评非常“给力”，常常是一语中的，切中要点。王老师语重心长却又不失严谨的风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师的点评意见不仅对两位同学论文的修改大有裨

益，也让在场的其他同学受益匪浅。在工作坊结束的时候，王老师还用亲切的语气鼓励大家热爱专业学习，珍惜大学时光，王老师最后的总结为本次论文工作坊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次论文工作坊是《新视界》编辑部主办第二次论坛。本次论文工作的成功举行不仅为师生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为编辑部以后举办类似活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有利于我们学生自己主办的活动走向更加成熟和制度化。



一个很好的平台，也为编辑部以后举办类似活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有利于我们学生自己主办的活动走向更加成熟和制度化。

三、2011年第2期论坛征稿启事

由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主办的“论文工作坊”第三期论坛拟定于2011年4月22日晚6:30在范孙楼440举行，第2期论坛的主题为“国际关系系2011届毕业生论文‘预答辩’会”，意在为2011届毕业生提供一个毕业论文答辩的“彩排”平台，帮助毕业生熟悉论文答辩流程、完善毕业论文。论文工作坊从即日起面向全校征稿。

1. 稿件要求

(1) 稿件要求采用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选题不限。提交的稿件可以是研究项目的设计，可以是正在进行中的研究项目报告，也可以是已经完成的论文等（注：本研讨会不接受已发表或出版的论文，判断是否公开发表以本次活动截稿日期准）。

(2) 字数：5000-10000字为宜。

(3) 论文注释形式为脚注，注释规范请参照《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4) 请在文章末另附页写明作者的姓名、系别、手机号码、电子邮箱等信息。

(5) 论文尽量做到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论述层次清晰，语言准确，文字流畅。

2. 投稿说明

(1) 投稿截止时间：2011年4月18日中午12点。

(2)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附件的形式提交，为方便统计，稿件请以“姓名_论文题目”命名，文件格式为Word2003文档（扩展名为.doc），邮件主题请注明“论文工作坊投稿·姓名_论文题目”。

(3) 来稿请发送至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4) 来稿后请注意查收《新视界》编辑部的确认邮件，如24小时内未收到回复，请直接与编辑部秘书处联系。

(5) 为了保护作者稿件版权，编辑部秘书处在会前通过电子邮件将所有稿件发送至讨论人提供的电子邮箱中。

3. 参会说明

(1) 参会讨论者原则上需要阅读其他参会作者的论文，并发表评论意见。

(2) 每位报告者的个人陈述时间为10分钟，每位点评者的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请与会者严格遵守时间。

(3) 个人陈述可自备PPT。

(4) 作者对稿件拥有最终解释权和修改权。

4. 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新视界》网站：<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新视界》秘书处联系邮箱：nklijintong@gmail.com

活动最新动态敬请关注《新视界》网站和我爱南开BBS (bbs.nankai.edu.cn)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版 (ZSG)。

[责任编辑：龚秀娟]



♣ 学术交流 ♣

星野昭吉受聘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南开新闻网) 3月24日, 国际知名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星野昭吉受聘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在范孙楼举行的仪式上, 校党委常委、教务长朱光磊向他致送聘书。

朱光磊对星野昭吉表示热烈祝贺, 他说, 星野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国际关系研究, 学识渊博, 多年来, 他曾多次来到南开为学子授课, 广受欢迎, 今天他成为南开教师中的一员, 今后也必将为提升相关学科研究水平、促进我校与日本合作交流做出更多贡献。星野昭吉对



受聘南开教授表示荣幸, 他希望今后能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志成宣读了星野昭吉的简历。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韩召颖主持仪式。

星野昭吉是日本独协大学法学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常务理事。1942年出生于日本东京, 1964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国际关系专业博士毕业。主要著作有《国际政治——冲突与和平根源》、《世界政治的原理与动力》、《世界政治的变迁与权力》、《国际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与结构》等。

致聘仪式后, 星野昭吉为同学们带来题为“东亚区域与中日美三边关系”的演讲。

国策论坛系列讲座之“当前亚太安全局势的分析与展望”

(通讯员: 邓子立) 2011年3月14日晚七点,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承办的“国策论坛”邀请到国际关系讲师、清华大学《国际政治科学》的特约编辑刘丰博士做了题为“当前亚太安全局势的分析与展望”的主题讲座。刘丰博士结合国际关系相关理论视角对东亚地区安全局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就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同学们进行了互动交流。

会上刘丰博士简要地介绍了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心得与经验。他指出,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研究东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国际关系学界近年来也在高度关注这一问题。随后刘丰博士简要地回顾了2010年以来东亚地区出现的重要双边或多边事件, 比较清晰的梳理了国际上风云变幻的“乱局”。同时, 分析指出由于东亚地区是二战遗产最多的地区, 所以在2010年的东亚地区的紧张关系多表现在领土主权的传统安全问

题上；进而从国际结构、国内政治和领导人个人因素三个层面对东亚地区安全局势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刘丰博士谈到中国的东亚政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政策建议。在国际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关键的是如何处理好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也就是中国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主题发言结束后，刘丰博士还就同学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互动交流。



此次讲座是南开大学“国策论坛”系列活动之国策系列讲座的第三场，讲座在同学们中间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同学们也纷纷表示当代青年对国家发展和国际事务十分关注，希望可以多举办一些此类讲座。

知名国际关系学者高大伟受聘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南开新闻网)2010年12月29日，知名国际关系专家、汉学家、中欧论坛创办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高大伟(David Gosset)受聘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并应邀作报告。

在省身楼举行的致聘仪式上，校党委书记薛进文向高大伟致送聘书，并为他佩戴校徽。校党委常委、教务长朱光磊主持仪式，校党委宣传部、国际学术交流处、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有关负责人出席仪式。

薛进文向高大伟受聘我校客座教授表示祝贺。他说，高大伟先生是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和南开大学的老朋友，多次热情推动中国与欧盟、天津与欧洲、南开大学与天津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并介绍了欧洲学术界、经济界、政治界的多位知名人士访问南开。

薛进文指出，当前，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随之而来的国际关系、大国关系也进入一个极其重要的调整变化时期，南开大学历来重视对国际关系的研究，相关专业也一直是学校重点支持的学科方向。近年来，南开大学积极创造条件，为中国外交、国际关系的研究方面注入更多的国际国内学术力量，相信高大伟先生加盟南开后，会积极参与各项学术

交流活动，推动南开相关学科的发展繁荣。

“在2010年即将结束之际，能够受聘南开我感到非常荣幸”，高大伟表示，“南开大学是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之一，可以与许多国外名校媲美，我本人在南开也有许多好朋友，很高兴今天正式加入南开这个大家庭，我将尽我所能为学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致聘仪式后，高大伟做了主题为“21 世纪的世界大局势”的学术报告，并与在座师生开展热烈交流。

高大伟，知名国际关系专家、汉学家，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曾获邀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访问学者，并受邀任教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以及欧洲、美国与亚洲各大学和国际知名跨国企业。于 2002 年创办“中欧文苑”，这个机构旨在促进中欧之间的互相了解，并开展文化、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全方面的交流，并同时创办“中欧论坛”。中欧论坛每年定期在一个不同的欧洲国家举办，志在推动中欧之间的高层对话。曾荣获西班牙国王授予的十字勋章与保加利亚共和国的荣誉勋章，以表扬他对中欧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发表过数篇关于中国与欧洲以及中亚问题的文章在法文、西班牙文、英文与中文刊物上，提出了欧洲、美国与中国之间一种可行的建设性三角关系的构想，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 师生活动 ♣

2011 年第 1 期国际关系论文工作坊成功举行

（通讯员：吕海）2011 年 3 月 11 日晚上 6:30，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主办的“国际关系论文工作坊”（Monthly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范孙楼 440 教室成功举行。本次论文工作坊邀请到国际关系系王翠文老师担任点评嘉宾，国际关系系大一到研一的 20 多位同学参加了本次论坛。国际关系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邓子立和陈冲两位同学分别向大家汇报了自己的研究设计和论文并与参加工作坊的同学们进行了激烈的互动讨论，王老师的精彩点评更是将本次论坛推向了高潮。

在主持人简短致辞后，两位同学依次展示了自己的研究设计和论文。首先汇报的邓子立同学，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双边 FTA 战略及其对东亚一体化的影响》（研究设计）。邓子立同学首先介绍了亚太地区的 FTA 发展情况，然后分析了中国的 FTA 战略的目标、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 FTA 战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他认为，由于中日之间存在 FTA 发生的模式和伙伴之争，中国的 FTA 战略对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并不一定发挥积极作用。由于邓子立同学在最后的总结中对新双边主义对东亚一体化的影响持悲观态度，而文中给出的一个事例却是对新双边主义对促进区域一体化有积极作用的佐证，因而在同学们中引起了一些困惑。通过大家的讨论，得出很多有用的建议，不仅对邓子立同学论文的修改有帮助，而且也让在座的同学在讨论中开拓了自己的思维。陈冲同学向大家汇报了他的论文《国际危





机调停供需因素的量化分析：解释调停的发生和效果》。在文中，他将国际危机调停的发生和结果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之中，分析了影响调停发生和结果的背景因素、需求方因素和供给方因素的作用机制，并利用国际危机行为（ICB）数据用大样本统计方法检验了他所提出的假设。陈冲同学对调停结果的研究特别注重了调停案例的“选择偏差”，因此他使用了赫克曼选择模型（Heckman Selection Model）进行回归分析。围绕这篇论文，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特别是在自变量的设置上，大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例如，文中关于调停供给方因素的测量不够准确，在变量的内部效度上还有待提高，特别是数据库中关于调停者信息的缺失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同学们的讨论中不时有很多中肯的意见让大家眼前一亮，将讨论达推向了高潮。

王翠文老师的点评非常“给力”，常常是一语中的。王老师语重心长却又不失严谨的风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师的点评意见不仅对两位同学论文的修改大有裨益，也让在场的其他同学受益匪浅。在工作坊结束的时候，王老师还用亲切的语气鼓励大家热爱专业学习，珍惜大学时光，王老师最后的总结为本次论文工作坊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次论文工作坊是《新视界》编辑部主办第二次论坛。本次论文工作的成功举行不仅为师生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为编辑部以后举办类似活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有利于我们学生自己主办的活动走向更加成熟和制度化。据悉，本学期第二次论文工作坊将于2011年4月中旬举办，欢迎大家届时积极参与！

吴志成教授的教育部哲学社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开题

（南开新闻网）1月23日上午，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志成主持的201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研究”开题报告会举行。

会前，校党委书记薛进文、常务副校长陈洪分别会见了前来参加开题报告会的专家学者，并代表学校感谢教育部社科司及各位专家对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关心和支持。

日前，201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立项结果业已正式公布。经教育部组织专家严格评审和面向社会公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志成教授领衔投标的“新时期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研究”最终获准立项，经费资助达80万元。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司副司长张东刚，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及来自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部委、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开题报告会。

张东刚对南开中标课题表示祝贺。他说，“新时期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研究”是本年度天津市唯一获批的项目，这是荣誉，也是责任。希望通过重大课题研究多出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并带动相关学科建设更上一层楼，将南开打造成国际政治学的重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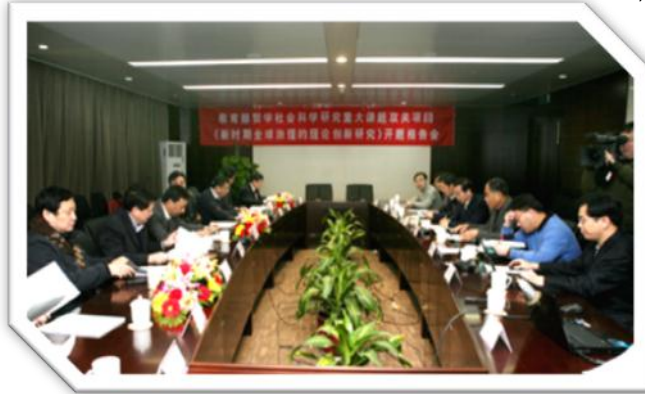
佟家栋对与会专家表示热烈欢迎。他希望专家们提出真知灼见，集中学术优势，在重点问题、核心问题上提供建设性的修改建议。

开题报告会由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处负责人主持。项目首席专家吴志成教授首先做了开题报告，从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基本框架、研究重点和前期基础等方面汇报了项目的总体情况。部分子课题负责人分别介绍了项目研究的重点问题。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主编林利民，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参赞杨义瑞，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所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主编杨雪冬，中联部《当代世界》总编辑金鑫，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蔡拓等专家，从项目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

等各个角度提

建议。
“新时期
理论创新研究”以
史演进为线索，
前沿理论为基
治学、历史学、
国际经济学等多学



阶段成果、最终成果

出了相关合理化

全球治理的理
全球治理的历
以全球治理的
础，运用国际政
环境学、法学与
科综合交叉的

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全球治理的历史与实践，分析全球治理的界定、特征、机制、理论与模式创新，探讨全球治理改革的必要性、措施及对传统理论、观念和国家主权思想的挑战，对民族国家体制、结构、管理过程的影响，进而总结全球治理的一般规律、经验教训以及对世界各地区域治理的启示与借鉴，尤其强调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变革的关系以及西方大国与新兴国家对全球治理的不同战略。本课题具体分为全球治理的历史考察、理论分析、国家视角、领域维度、国际机制建设、未来发展和理论创新等七大研究板块，重点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的创新理论——“和谐世界”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应用——“和谐外交”。

[责任编辑：权贤美]



2011 年暑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培训班报名通知

今年暑假，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将分别举办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暑假期研讨班。由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边燕杰教授发起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夏季研讨班于是从 2010 年 5 月开始启动由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始创办的。为了培养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该研讨班拟通过邀请国内外专家开设专题讲座，辅以学员互动交流，同时系统地教授相关的实证社会科学的一般分析方法，社会网络理论和分析方法为中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培养实证社会科学人才。而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由杜克大学的是牛铭实教授等老师在于 2006 年发起创办。他们试图从传播研究方法的认识和训练为切入点，帮助中国公共管理和政治学界提升学术水平。培训班已经先后在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开展培训。今年暑假将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和管理学院，美国校际联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部和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联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培训班”。

一、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夏季研讨班

时间：2011 年 7 月 18 日—8 月 13 日

地点：西安交通大学

授课教师和课程名称：

- **Martin Whyte**，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家庭社会学与研究”（英语）
- **Peter Li（李胜生）**，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不平等理论和分析方法”（英语）
- **Yaojun Li（李姚军）**，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流动分析方法与研究”
- **王丰**，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21 世纪人口问题”
- **黄伟**，美国俄亥俄大学商学院教授/西交大管理学院执行院长：“信息管理研究”
- **郝虹生**，美国 WESTAT 研究公司高级研究员：“调查抽样与样本加权”
- **边燕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东亚社会的社会资本”
- **宗力**，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副教授：“种族关系问题与研究”
- **陈皆明**，美国农工大学教授：“中级社会统计”
- **郑路**，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德克萨斯 A&M 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事件史分析方法”
- **梁玉成**，香港科技大学博士/中山大学副教授：“多层次模型分析”
- **吴愈晓**，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博士/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定类数据分析”



- 朱晓文,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育测量和统计博士/美国 DRC 公司教育测量统计师: “追踪数据分析”
- 李黎明, 西交大人文学院副院长/实证社会科学研究副所长: “电话调查的设计与管理”
- 张顺, 西交大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分位回归分析简介”
- 张磊,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研究生: “社会网络数据分析技术”

费用:

1. 学费: 3000 元/人/期 (学生可申请减免一半)
2. 食宿交通: 自理。住宿以优惠价安排西交大招待酒店和宿舍。

报名办法:

2011 年 5 月 31 日报名截止日前, 请将填好的报名表 (见网站主页) 用传真或电邮方式发给联系人, 6 月 20 日前通知录取结果, 并告知具体事宜。

联系人: 王瑾 (电话: 029-82666249)

传真: 029-82666249, 82668281

E-mail: iessr@mail.xjtu.edu.cn

网址: iessr.xjtu.edu.cn

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

时间: 2011 年 7 月 11-8 月 5 日

地点: 上海财经大学

课程安排:

今年的培训课程前2周以基础课程为主, 后2周为高阶与应用课程。授课教授多为国(境)外特邀, 机会难得。内容包括开宗明义的研究方法导论、各种收集和分析数据资料的科学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和博弈论。除了研究方法的课程, 也针对公共管理与政治学者的需要, 特别设计了成本效益分析、公共预算与财政、绩效管理、美国政治学前沿专题等课程, 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和专长, 自由选修有兴趣的课程。根据学员选修的课程, 课程结束后, 符合课程修业规定的学员, 将由主办单位发放证书。今年的培训班除了提供深浅多元、循序渐进的各门方法课程外, 并特别邀请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治系的Dean Lacy教授, 用英语讲授美国政治学的一些前沿专题, 一方面提供学员更多选择的空间, 另一方面更适合于计划出国深造的学员, 因为它不仅可以强化科研必备的方法训练、还能提供接触国际一流专家、英语专业授课的机会, 帮助学员与国际接轨。除了参加培训班的课程, 在7月16、17两日, 培训班的学员还有机会参加由复旦大学主办的“2011年首届中国政治科学研究与方法工作坊”,



现场观摩与会学者的论文发表与讨论，提升科研视野与实操技巧。有意投稿的学员，请到复旦大学的网站了解“工作坊”的投稿办法：

<http://www.sirpa.fudan.edu.cn/s/56/t/134/40/58/info16472.htm>

2011 暑期方法培训班课程安排和任课老师 (7月11日-8月5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第一周	7月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9:00-10:20	研究方法导论 (牛铭实, 陈捷)					2011 年首届中国政治科学研究与方法工作坊, 欢迎参加。	
10:40-12:00	定性研究方法 (汤京平, 耿曙, 洪永泰)						
2:00-3:20	计量分析 (一) (陈陆辉, 王德育, 张光, 庄文忠)						
3:40-5:00							
7:00-8:30	统计套装软件SPSS之应用 (庄文忠)						
第二周	7月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9:00-10:20	抽样理论方法						
10:40-12:00	调查研究法 (游清鑫)						
2:00-3:20	计量分析 (一)						
3:40-5:00							
7:00-8:30	统计套装软件Stata之应用 (俞振华)						
第三周	7月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9:00-10:20	计量分析 (二) (俞振华, 苏毓淞)						
10:40-12:00	美国政治学前沿专题 (Dean Lacy)						
2:00-3:20	博弈论 (黄海峰)						
3:40-5:00	成本效益分析之理论与实务 (郭昱莹)						
7:00-8:30							
第四周	8月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9:00-10:20	计量分析 (二)						
10:40-12:00	公共预算与财政 (苏彩足)						
2:00-3:20	博弈论						
3:40-5:00	绩效管理: 理论与实践与研究 (丁元)						
7:00-8:30							

课程老师介绍:

- 牛铭实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管学院院长)
- 陈捷 (美国老领地大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长江学者)
- 陈陆辉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主任)
- 王德育 (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教授)
- 张光 (厦门大学教授)
- 庄文忠 (台湾世新大学副教授)



- 汤京平（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 耿曙（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 洪永泰（台湾大学教授）
- 游清鑫（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研究员）
- 俞振华（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 苏毓淞（北京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
- 黄海峰（美国加州大学美熹德分校助理教授）
- Dean Lacy（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
- 郭昱莹（世新大学行管系教授兼系主任）
- 苏彩足（台湾大学教授兼台湾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 丁元（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教授）

费用：

培训班不以赢利为目的，但由于运营成本必须靠学费来支付，因此参加的学员，不论选修多少课程，已任教的老师，每位需缴学费3000元，在校学生的学费为1500元。食宿交通费用，学员自理。主办单位会协助学员以优惠价在上海财大附近酒店订房。外地学员在沪的住宿用餐费用，每人每日预估约人民币100元。

报名方法：

1. 有意报名者请提供个人简历一份，并附加说明曾经受过那些研究方法的训练、对培训班的那些课程特别有兴趣，以Word或PDF格式，发送到培训班信箱：

peixunban2011@gmail.com。

- 2. 由于名额有限，越早报名的被录取的机会越高。
- 3. 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1 年 4 月 30 日，逾期不再接受申请。

[责任编辑：王芳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成立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总部位于华盛顿，与世界银行并称为世界性两大金融机构，由理事会、执行董事会、总裁和常设职能部门等组成。其成立的宗旨为促进国际贸易平衡发展，调节各国货币汇价，提供临时资金扭转外贸失衡等。该组织投票权改革（尤其是中国投票权上升）进程引人关注，鉴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对全球金融贸易体系影响力的显著上升趋势，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经济局势，依据改革方案，中国在该组织的投票权份额将从目前的 3.72% 升至 6.39%，排名从并列第六跃居第三，这次重大改革将进一步推进全球经济多极化和均衡化，但也应看到，权力的上升意味着义务和责任的增加，对中国进一步应对复杂国际环境和深入参与国际机制建设提出挑战。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一、总 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中文字体为宋体，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字号小五，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二、中文注释

（一）著作

1. 专著：著者，文献名，卷册序号，出版地，出版机构，出版时间，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1 页。

2. 编著。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0-68 页。

3. 译著。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在文献名之后，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如为三人以上，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宇燕、盛洪：《旧邦新命》，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欧洲研究前沿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9 页。

（二）文章

1. 文集论文：著者，文章题目（加书名号），文集编者名称，文集名，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9-117 页。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第 109-117 页。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 年 6 月 15-17 日，第 3 页。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 年 4 月，第 55 页。

（三）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

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3 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 2006 年 2 月 12 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 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60 页。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一）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入）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二）文章

1. 文集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文集编者，文集名称（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刊物名称（斜体），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三）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一) 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不论中外文，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 101 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二) 转引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2 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1 页。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 年 11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0 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4 日）。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一) 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165-176 页。
5.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著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首行缩进 2 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征稿启事

本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本刊编辑部承办，现面向广大师生长期征稿：

一、引介国际关系理论：包括学术论文、书评及新书架栏目。

论文习作：传播研究成果，加强学术争鸣。论证严密，语言流畅，标点符合规范（参考《国际关系学系论文注释体例》）。字数以 3000-8000 字为宜。

书山有路：品茗大师杰作，抒写我辈见解。不是随意的感想，也非勤奋的摘抄，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严谨客观是首义，独立见解为二德。字数以 3000-8000 字为宜。

新书架：放眼全球，把握书界动态。以笔传神，通晓新书梗概。投稿请注明作者、中英文书名、出版社等，以 250-300 字为宜。

二、关注国际时事动态，“煮酒论英雄”

青梅煮酒：天下大事谁是英雄，功过是非国关热点任君评说。投稿长短不限，观点鲜明。

三、搭建广大师生间交流与沟通的平台：包括“笔谈”、“他山之石”、“院系活动”栏目。

笔谈：独立思考，个性表达；精悍短评，关怀天下。以 900-1500 字为宜。

他山之石：经验交流，心得汇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字数不限，畅所欲言。

院系活动：或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沙龙，或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社会实践。欢迎报道院系活动，展示院系风采，200-500 字为宜。

这是一个飞扬着激情与梦想的舞台！

在这里，你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在这里，你可以畅游天地，飞跃古今；在这里，你可以重塑思想，锻造灵魂！

在这里，你可与所有今时的国关学者对话；在这里，你可与所有不远的国关研究共行；在这里，你可与所有未来的国关方向同步！

这是一本杂志，但它的读者也是它的作者；这是一部刊物，而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意义！

如果，你觉得前面的话都是夸大其词，那么，请你拿起你手中的笔——因为只有你，能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本刊并非全国公开发行刊物，但采用首发稿，一经采用即向作者免费寄送该刊物一本。来稿请发送至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